

文學於公共空間中的生成、實踐與傳播： 以一九四〇年代 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公共領域為例*

黃慧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觀光研究所
E-mail: yuyu0818@gmail.com

摘要

本文以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理論為視角，探討一九四〇年代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如何透過空間、文本與媒介建構文學公共領域。首先，分析沙特等人在咖啡館等公共空間的創作實踐，揭示文學生成與社會場域的互動；其次，探討文學如何將私人經驗轉化為公共倫理辯證，召喚讀者主體性；最後，以期刊《摩登時代誌》為例，說明作品如何經由媒介守門員篩選進入公共討論。結論指出，文學不僅是審美活動，更是公共實踐，其流通乃空間、文本與媒介的動態互構。即使在網路分眾時代，文學公共領域透過虛實空間的重新建構，仍具民主討論與社會批判的潛能。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投稿日期：114.5.20；接受刊登日期：114.10.13；最後修訂日期：114.10.26

責任校對：梁日彰、林碧美、張文綺

* 一篇論文的完善有賴多方的協助，由衷感謝審查人、編輯的專業建議與寶貴意見，以及校對人員的編排校正。

關鍵詞：公共空間、文學公共領域、存在主義、
哈伯瑪斯、媒介守門員

壹、網路分眾時代來臨，公共領域走向虛擬化，抑或衰退化？

哈伯瑪斯 (1990/2002) (Jürgen Habermas)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¹ 中指出，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透過沙龍、咖啡館與俱樂部中對文學、藝術、音樂、戲劇等文藝作品的閱讀、賞析與評論，培養個體的反思能力與獨立判斷，促成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並逐步發展成以公共事務討論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理想的公共討論以「公共性」(publicité) 為原則，即秉持理性批判的精神，公開討論與公共利益相關的議題，並監督國家權力。討論所形成的公共輿論，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重要中介。然而，當我們將視角轉向當代網路時，可以發現，社群媒體上的私人言論常被誤認為是公共利益言論，看似開放且討論熱烈，實則更類似於傳統的書信式溝通模式 (私人表達的公開傳送而非多元討論)，既無法被視為公共領域，也難以歸為私人空間 (Habermas, 2023: locs. 140-141)。這些「泡泡空間」(bulle) 與傳統公共領域的共同點，是它們同樣具有開放性與可連結性的特質，但又與真正的公共領域有著根本性的不同：它們會排除異議的聲音，

¹ 哈氏《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法語譯本於 1978 年上市時，書名的詞彙選擇並非「公共領域」，而是「公共空間」：「espace public」，這與當時的時空背景有關。七〇年代末的法國正處於空間研究熱潮中，「公共空間」已為人所知，使用此詞彙有其出版的市場考量，也較常出現在都市規劃師、建築師，或景觀設計師的專業辭彙中，是具體可訪問地點，具有地理位置和明確界定的邊界，對大眾開放，提供居民日常使用與社會活動的物理空間。而所謂的「公共領域」，指的並非是地理或領土性的概念，而是民主制度中多元觀點流通與表達的場域，私人意見在此轉化成公眾討論或媒體報導，是一種文化與社會的運作方式，屬於政治哲學的詞彙範疇，近來也被納入傳播學的語彙 (Paquot, 2009: 3-4)。

而將立場一致的聲音納入某種假定的「知識」框架中，卻未經過任何專業過濾機制的檢驗。對此，哈伯瑪斯提出了明確的警示：這種溝通模式的轉變，正在扭曲公民對政治公共領域的認知，並威脅到公共輿論生成的基本機制。這不再是一種潛在的危機，而是在越來越多社群媒體使用者身上具體發生的現實 (2021/2022: 15)。

瑞士媒體哲學學者阿洛亞 (Emmanuel Alloa) (2017: 34-35) 亦對此提出警訊：非主流觀點因「沉默螺旋」(*spirale de silence*) 在網路空間噤聲，甚至在大眾視野中銷聲匿跡。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無視網際網路的基礎設施、演算法、平臺規範、介面功能、交流文化等，依舊認為它是個非物質化的中性空間、多元話語的公共領域。事實上，即便看似再虛擬的空間，都無法否認其物質性的基礎設施，背後的空間規範更無時不刻地引導我們的言行舉止，甚至削弱公共討論中必要的相異性與真實回應。如果我們對此有所警覺，便更能理解為何僅靠虛擬平臺無法支撐一個具政治行動力的公共領域。再者，沒有身體的實際在場，缺少語言之外的感知線索與互動氛圍，如姿態、目光與空間節奏，也限制了彼此理解與信任的建立，使溝通淪為觀點的碰撞，而非共識的生成。因此，一個具有政治行動力的公共領域，需要實際的集會和互動場所，讓不同背景、社會階層和年齡的群體可以進行發自內心的交流，透過聽覺、觸覺和嗅覺等感官體驗，相互接觸和理解 (Rosa & Voiron, 2022: 97)。這樣的觀點強調人類作為具身體性的存在，虛擬媒體空間無法取代實體場所所帶來的具身互動性。

此外，公共領域的本質不應只被視為單純的制度或程序，更應被理解為一種涉及感官、情感和美學實踐的生活方式。美國政治思想家喬治·凱特布 (George Kateb) (2000) 認為，民主須具備一種美學特質，「即對人、對事、對情境最大的感受力與回應能力，同

時意識到世界運作的邏輯、規律與結構，並有所行動」(31)。也就是說，「民主美學」(*l'esthétisme démocratique*) 並非來自個人立場的即時情緒投射，或易被操弄的濫情表達，而是與之相對的同理心、審美能力與細膩感知的結合。這是為什麼文化藝術作為溝通媒介，在民主討論中的角色不容忽視。尤其在哈伯瑪斯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框架下，理性討論與公共對話的能力於當代社會愈顯重要，而文學與文化能為價值觀、理念與意見的交流提供關鍵平臺 (Forslid & Ohlsson, 2010: 432)。進一步來說，若要使這類平臺真正發揮民主溝通的功能，並避免公共領域淪為情感操弄的工具，便需依賴公民具備複雜思維與道德判斷的能力。而文學作為倫理思辨的空間，不提供單一解答，而是揭示自由與責任、個體與群體、記憶與遺忘等價值張力。這些灰階與衝突讓讀者學習延遲判斷、容納矛盾與多元真理。如此訓練所培養的，不只是理性辯論能力，更是一種融合情感與理解的溝通形式，為政治公共領域中的包容、理解與衝突解決奠定心理與認知上的基礎。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若溝通的基本條件是透過接收對方的訊息——包含聲調、語氣、表情、肢體語言與動作等感官訊息——並以更敏感的接收與回應能力來回進行，那麼，除了使人意識到實體空間的溝通環境不可取代外，什麼樣的文學作品能使討論成為倫理思辨的場域，傳播公共輿論，回應當代社會議題，進而影響社會思潮？另一方面，在思考公共領域場所條件層面時，又如何補足哈氏對物理空間的忽視。² 尤其是當我們聚焦於文學公共領域時，實體空間

² 哈伯瑪斯在關注民眾如何從官方控制的公共領域中奪回話語權，並將它轉化成一個能批判國家權力的獨立領域時，其焦點不是領域的具體場所，而是過程本身，也就是公共輿論如何與啟蒙時期發展起來的讀書會文化、藝文評論雜誌、出版媒體的軌跡密不可分。換言之，哈氏在討論公共輿論的形成時，強調的是對話者的語言、邏輯使用是

在文學交流的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呈現了什麼樣的物理特徵，又如何影響文學的生成與實踐？

故此，本文在公共領域的基礎上，欲突顯出「公共空間」(espace public) 對文學現象所發揮的作用，尤其是城市環境如何影響文學形式與其推廣。研究對象將不只關注文學作品，亦聚焦於產生文學現象的外部環境，也就是文學家如何利用城市空間、文學活動的核心據點（酒吧、咖啡館、出版社等）。從而強調出這些場所的地理條件（環境、歷史背景）、位置（地點、區域）對作家間的交流、文學運動的影響。換言之，以「公共空間」這一概念補充說明文學流派形成的過程，從而突顯出場所因素在思想與知識流通上的角色。對此，法國媒體傳播學者巴拉里尼 (Loïc Ballarini) (2010) 提出了整合物理性與傳播性的「公共空間」概念：

公共空間應該被視為一組動態的過程，既涉及象徵性的場域，也涵蓋實際的地理空間。它的本質上是分散且多元的，既具有地方性，又同時是一個對話的交流場所，並透過媒體得以擴展。此外，它受到內外部權力關係的影響，這些張力來自不同社會場域的交錯與滲透，塑造了地方性的公共空間。尤其個人在公共空間中的行動和交流，受到從小到大的社會化過程影響，這包括家庭教育、學校培養，以及社會環境的塑造。(19)

如果說哈伯瑪斯強調公共領域生成的歷史因素，並由此歸結出一個屬於資產階級、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理想範式；巴拉里尼則從歷史與身分性導向的空間地方性出發，將公共領域具體化為帶有地方特色的公共空間。尤其，巴拉里尼受鄂蘭 (Hannah Arendt) 對公

否符合理性對話的條件（憲政體制、哲思框架、歷史背景），以及最終能否達成共識。實踐交流的實體場所並非深入探討的重點，沙龍、咖啡館、常客會館被視為「城市機構」，僅為成就公共領域的歷史環境背景（哈伯瑪斯，1990/2002）。

私領域概念的啟發，以古希臘城邦的廣場 (agora) 舉例說明公共空間的時空限定性，並認為這樣的公共論壇屬於特定的歷史時期。論壇研究雖然能帶來許多啟發，但前提是必須將它置於古希臘的歷史與地理脈絡中來理解，而不能簡單地將它當成適用於所有時代的理想模式。因此，他建議對公共空間的運行結構與模式做嚴謹、具體的檢視：「放棄那些什麼黃金時代的想法，意味著我們終於體認到，公共空間並沒有消亡，而是不斷的演進，甚至轉型」(Ballarini, 2010: 16)。

既然公共空間、抑或公共領域，並沒有所謂的巔峰期，也不具某種普世性的理想型態，而是順應不同的時空條件，以相異的形式持續變動與再生，由此彰顯其存在的事實與必要性。那麼，欲對其運作模式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就須從歷史軸線上的轉型軌跡來思考，也就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深入探究它在某個特定時代的運行機制，以便瞭解其結構的組成與各部分的互動模式。因此，本文將從具體場所的物理性與象徵性出發，重構公共空間在歷史語境中的文化運作機制。也就是除了對空間的功能分析外，亦探詢其與規範社會行為的文化結構之間的關係，進而關注公共空間如何影響文學的生成與實踐，以及其公共性如何透過文學作品來體現，成為公民主體性養成的訓練場。換言之，文學公共領域作為一個所有公民皆可進入的象徵性空間，其中思想以何種言說方式流通和討論；作家們又如何透過傳播媒介（包含咖啡館、文學作品與期刊），擴大公眾對文學的接觸，形成與現實相關的公共輿論。在案例選擇上，為了具體呈現地方性空間與特定歷史條件對文學活動的影響，本文選擇戰後巴黎聖日耳曼德佩區 (Saint-Germain-des-Prés) 為例，聚焦於沙特 (Jean-Paul Sartre) 與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作家們流連

其中的公共空間，藉此呈現文學公共領域在空間、作品與傳播實踐之間的各層次面向。

貳、二戰後巴黎聖日耳曼德佩區與存在主義文學的興起

聖日耳曼德佩區位於巴黎中心地帶，左岸的文化核心地帶，緊鄰拉丁區，後者包含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索邦大學 (La Sorbonne)、亨利四世高中 (Lycée Henri-IV) 等重要學府。根據 1950 年的統計數據，聖日耳曼德佩區共計 11 間出版社、四間印刷廠、57 間書店，聚集了全巴黎密度最高的文創業者，包含作家、評論家和媒體公關人員等。一些知名出版社 (如 Seuil、Flammarion、Plon) 曾因經營考量搬離此區，但最後都因切斷了與作家或記者的寶貴連結與即時交流的便利，再度搬遷了回來，或至少留下一處辦公據點 (Dussault, 2014: 16-17)。教育知識體系在此高度集中化，學術思想流派因優渥的土壤迅速傳播。畢業於此區高等師範學院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 的沙特，與他的同學及日後的合作夥伴如梅洛－龐帝 (Maurice Merleau-Ponty)、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等人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相互啟發、激盪思維，共同促成了存在主義的形成。學術背景的優勢使沙特的著作受到出版社、報紙和學術機構的支持，而團隊的協力合作，也使得存在主義作家得以接觸到各界菁英，尤其是該區受良好教育的讀者群，透過他們的閱讀與討論，思想進一步得到了傳播。

如果說空間結構了社群關係，那麼歷史因素則強化了社群的內在連結。一戰重擊了啟蒙時代以來建立的性別與階級秩序，以及人們對理性進步的信念；而二戰則迫使人類直面戰爭的破壞性 (如核武、納粹與種族屠殺)，並進一步體認到存在本身的荒謬與無意義。

這種焦慮迫使閱讀群眾（中產階級）的思考更加內在和哲思化，但又無法完全拋棄原有的價值觀。他們在迷惘與矛盾中找尋新的信念支點、一個不會動搖的道德或精神依託。沙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中應運而生。他的諸多文學作品，直面當時人們所關心的主體性、自由與責任等問題。小說《嘔吐》(*Nausée*, 1938) 描繪敘事者在對世界的厭惡中，逐步覺察存在的荒謬，並展開對自我存在意義的探尋；短篇小說集《牆》(*Le Mur*, 1939) 透過不同角色行動與選擇的演化，展現日常生活偶發性與命定論規律性之間的張力；劇作《蒼蠅》(*Les Mouches*, 1943) 改編古希臘神話，以悲劇形式反思罪責、自由與反抗，而《幽禁》(*Huis-clos*, 1944) 則透過「他人即地獄」的閉鎖場景，揭示主體性如何受制於他者的凝視與評價。長篇小說《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第一卷《不惑之年》(*L'Âge de raison*, 1945) 的主人公面對個體的生存難題，在婚姻與自由的兩難中，質疑責任的真義；第二卷《緩期執行》(*Le Sursis*, 1945) 將個體放置於戰爭與歷史即將來臨的壓力下，描寫人在行動與逃避之間所面臨的道德困境；第三卷《靈魂之死》(*La Mort dans l'âme*, 1949) 則在國家崩潰與社會瓦解的背景中，揭示行動的徒勞與道德判準的模糊。

綜觀沙特一九四〇年代的文學創作，可見他試圖透過對時代精神的哲學詮釋，與當代讀者展開思想對話。對於寫作對象，他曾明言：「我不認為我們應為菁英分子書寫，而是要為廣大的社會群眾，不論是以何種形式」(as cited in Mosna-Savoie, 2025: 01:47)。即便其哲學著作展現出針對菁英階層的理論深度，沙特心中真正的書寫對象，始終是廣大的大眾讀者。為了將學理思想轉化為能與群眾溝通的公共語言，沙特嘗試過不同的媒介形式，包含評論、劇作、小說、講座、期刊與媒體訪談。文學評論為他的創作形式提供了能自

我辯護的理論基礎；劇作與小說則以敘事與對話的方式，將哲思轉化為能與大眾對話的通俗形式。此外，在廣播與電視崛起的年代，沙特熟知如何利用新興媒體的傳播力量，透過訪談媒體曝光，將文學作品納入公共討論的話語網路中，藉由與時事的連結，探討自由、責任、戰爭與人性等議題，擴大讀者群至非傳統文學領域的讀者，如政治關注者、哲學學生，甚至一般市民。

除了作為媒體的受邀者，沙特更是輿論的發起者。二戰期間，沙特已於當時最具權威性的文學期刊《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RF*) 發表了數篇論文。期刊的出版社社長加利瑪先生 (Gaston Gallimard) 同意於 1945 年出版沙特、波娃與梅洛－龐帝等人創辦的《摩登時代誌》(*Les Temps modernes*)，此舉並非認同《摩登時代誌》欲推廣的存在主義文學，而是「不能讓沙特的期刊在其他出版社出版」(Demoulin et al., 2023: loc. 49)，加利瑪先生在一次與友人的書信中如此陳述。然而，社長的擔憂依舊到來。³《摩登時代誌》一出刊就攪亂了當時的期刊場域的權力秩序，重組了戰時形成的刊物與知識分子的位階，五年內即獲得當時最具主導性的地位 (Boschetti, 1985: 185)。從選文來看，這份綜合性月刊不僅刊登新銳作家的文學作品、文學評論，亦發表一些與時代緊密相關的時事評論，尤其在辨析道德與政治關係的代表性論文中，不做

³ 沙特透過與加利瑪出版社的合作，攫取了該出版社，特別是其旗艦刊物《新法蘭西評論》長年累積的象徵資本，進而推翻該刊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所建立的文學秩序；他正是藉由這樣的手段，在加利瑪出版社於戰後名聲受損、地位動搖的時刻（因戰時與德國合作），重新確保並再生產了出版社在文學場域中的權威位置。然而，這樣的結盟終究只是短暫的權宜之計，因為雙方在文化立場與知識實踐上存在深刻的分歧，《摩登時代誌》始終無法融入《新法蘭西評論》所代表的菁英人文傳統，前者強調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與時代介入精神，與後者以藝術自主與純文學為核心的審美立場格格不入 (Sapiro, 1999: 592)。

脫離現實的純理論探討，而以具體的歷史情境為例，致力發揮一種世俗的道德作用，不僅為戰後精神迷惘的知識分子指點迷津，也吸引了那些不依附於特定正統學說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而成為一個開放的思想論壇 (187-196)。

媒體傳播使存在主義從哲思體系，轉換成一種集體性的社會與文化現象，而期刊作為文化場域，不僅構建了這一背景，更強化了哲學家的影響力和支持者的群體。這是何以存在主義無法單就哲學的理論角度加以定義，正如存在主義文學亦難以僅就文本內部的結構、意義或語言來理解。唯有將存在主義文學置於文本外的歷史脈絡中，觀察作品與哲思、生成的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模式，方能理解其作為一種動態的文學公共領域現象。因此，有必要改變與擴充用來分析文本的理論工具，轉向一種能處理文本與社會脈絡互動的取徑。若以「公共領域」作為概念橋樑，將有助於彌合文本內部詮釋與更廣泛文化分析之間的落差，並使研究焦點於文本在社會脈絡中的影響力與實踐性 (Forslid & Ohlsson, 2010: 432)。本文擬以沙特的文學生產與思想實踐為例，探討文學公共領域的運作邏輯，並從三個層面切入分析：一、時代背景與實體公共空間（如咖啡館）對文學生成的影響；二、沙特的存在主義文學如何體現文學的公共性實踐；三、《摩登時代誌》在文學理念的傳播與輿論形成中的功能與角色。

為此，沙特與波娃等存在主義作家的書信、傳記、訪談與文學評論，將作為研究的主要文本基礎。分析將同時涵蓋物質性公共空間、文學作品與相關期刊，這些既是輿論載體，也是關鍵詞檢索與分類的主要目標。在理論框架建立後，首先以人工閱讀篩選出符合框架的文本，作為主題分類的依據；同時，在有 EPUB 格式的文獻中，以「酒吧」(bar)、「咖啡館」(café)、「雙叟」(Deux Magots)、

「花神」(Flore) 等關鍵詞進行搜尋，辨析出具有分析意義的段落，將其納入相關的章節分析中。這些歷史資料提供基礎，指向一個貫穿各時代的核心議題：思想如何離開私人領域，進入公共討論？因此，研究法將不從文獻學角度討論文獻的校勘、保存或出版，而是以跨學科的研究取徑（涉及哲學、傳播與空間研究），將資料置於特定歷史情境中，探討其作為歷史見證對當代理解與文化意義的啟示。具體來說，研究重點將聚焦於文學作品與期刊如何透過與公共場所的交織，形塑社會參與的文化現象與歷史實踐，藉此提供理解文學介入社會辯論與公共意見建構的過程，進一步豐富當代文學公共性研究的理論資源與方法論基礎。

參、從私人到公共：文學公共領域的空間條件與理性溝通的傳媒挑戰

為理解哈伯瑪斯的文學公共領域如何運作，首要之務便是釐清「公」、「私」領域界線在歷史上的位移，並區分「公共性」與「公共領域」(*sphère publique*) 兩個層次不同的概念。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正是在一系列原本屬於私人生活的活動中萌芽——如家庭閱讀、書信往來，以及在沙龍、俱樂部與咖啡館等半開放空間中的討論。如果我們誤以為「私領域」永遠只能是家庭或個人情感，就無法理解文學何以在私人空間中產生公共討論的功能。正如哈氏所說，十八世紀的私人領域培養了理性討論的內在條件，孕育出具有公共性的言論批判空間，這正是「文學公共領域」出現的基礎（哈伯瑪斯，1990/2002）。若不釐清這些概念之間的差異與歷史變化，就難以掌握文學何以作為一種溝通實踐，透過具有公共性的文本與討論，介入社會、影響輿論，進而形構當代的公共領域。因此，下

文將針對這些概念進行簡要的歷史梳理，並在此基礎上探討空間形塑力與媒介特質的轉變。

古希臘時期，共和廣場的公民討論關注的是與城邦治理相關的公共議題，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分工是明確的。個人藉由參與政治、言論與辯論等活動來表達自我，使其個性鮮明，並依此獲得永恆的名聲；而私人領域則負責生產家族生存的必需品，涉及支配的勞動力（奴隸）和連帶的經濟活動。這些財產是通往公共領域的前提，缺乏維持家庭經濟的條件，將有礙進入公共領域。失去財產等於失去公民身分，無法參與城邦政治，亦即一種社會懲罰（哈伯瑪斯，1990/2002: 4）。這種公私領域的區分模式，到了封建時期不復存在。當時領主權力不具有現代民法意義上的私有權，農民在當時也沒有私人地產（6）。此時期唯一稱得上私人空間或私密性的，是識字者為自己的默讀、書寫日記或私人通信。透過這些訓練，受過教育的個體逐漸從周圍世界抽離出來，與自我對話，或是與親密的人進行私密交流（Ariès & Duby, 1985）。

十六世紀以降，歐洲宗教戰爭帶來社會分裂的危機，維持社會的凝聚力成為當務之急，世俗化的政治秩序因而成形：個人的意見、信仰、觀點保留在私人領域內，國家由一種新的政治理性來支配，這種理性不同於個人意見，亦非宗教或個人信仰，而是一種意識型態的中立。自此，公共與私人、理性與意見、政治與道德開始分離，但若沒有公眾秉持著個體「內在良知」（*for intérieur*）的自主性來批判公共事務，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也無法產生（Ferry, 1989: 17）。換言之，開放的空間——無論是實體還是虛擬——不必然產生「公共性」。公共性的建立，依賴於一種出自內在良知的批判態度，並透過「在公眾範圍內進行的公斷」（哈伯瑪斯，1990/2002: 33）來實現。唯有此一批判與討論的過程所形成的公共輿論，才構成公共領

域得以形成的關鍵條件。尤其在十八世紀，隨著印刷術的發展，通信、書籍、報章雜誌得以更廣泛流通與閱讀，加速了知識與思想的交流。人們將閱讀小說或寓言時所形成的內在理解，轉化為沙龍或咖啡館的藝文評論、倫理探討或時事辯論。這些場所成為文學公共領域的核心場域，使個人在討論中體察自我意識與他者的差異，也習得以平等、理性為基礎的文雅溝通方式（哈伯瑪斯，1990/2002: 47）。⁴ 簡言之，「主體性」的培養使個人在公共領域中具備發聲的能力，是市民社會理性辯論的前提；而「公共性」則賦予個體發言的意義，使其不僅限於個人層面，而能為公眾利益服務。

然而，文學素材的公共性轉化是否有效，不僅取決於對話者本身的語言理解與表達能力，也仰賴於交流場所是否具有足夠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比利時社會學者貝爾熱（Mathieu Berger）（2018: paras. 16-17）指出，為了讓公共領域順利運作，讓原本各自立場與生活經驗差異甚大的個體得以彼此理解，哈伯瑪斯在《溝通行為理論》（*Théorie de l'agir communicationnel*, 1987）中強調語言溝通時所需建立的「主體間相互理解」（*entente intersubjective*）（Habermas, 1981/1987），⁵ 卻對於個體如何在具體的「場所」（*lieu*）與「場域」（*milieu*）中被接納並參與討論，著墨有限。因此，貝爾熱引入「接

⁴ 哈伯瑪斯特別強調，這並不意味著當時這些場所完全消除了社會階級，但至少在這些特定的討論環境中，等級的重要性被有意忽略了。這些討論不是建立在「法律上的平等」，而是透過文化與禮儀來創造一種「去等級化」的氛圍（哈伯瑪斯，1990/2002: 47）。

⁵ 當哈伯瑪斯談到「溝通行動」時，他指的是參與者願意以理性協調的方式來安排行動計畫，並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取得共識。這種共識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每個參與者都承認對方提出的語言主張具有某種「有效性」，其中包含三個層次：（1）真理性：所說的內容是否符合客觀事實（關於現實世界的說明）；（2）正當性：所說的內容是否符合群體內部的社會規範（例如公平、正義）；（3）真誠性：所說的話是否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內在經驗與感受（Habermas, 1983/1991: 79）。

待與歸屬社會學理論」(sociologie de l'hospitalité et de l'appartenance) (Stavo-Debaugé, 2009), 強調公共性不僅是語言溝通的產物, 也深受空間條件與社會環境的影響。更具體地說, 一個交流場所能否接納不同背景的個體, 是否允許他們表達與發聲, 將直接影響私人經驗能否被轉化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他將這種空間性的考量, 延伸至公共領域的研究, 主張應補足「場所」的內部接收機制, 以及「場域」與外部社會的關係, 才能真正理解溝通如何發生、公共性如何成形。

事實上, 場所內部關係的「接待性」(hospitalité) (Berger, 2018: paras. 2-4) 涵蓋的現象範圍極為廣泛, 不僅限於提供住宿、食物或對個人與群體的基本保護, 也就是生活上最低限度的「消極接待」(hospitalité négative), 其目的在於防止極端苦難, 如寒冷、飢餓或迫害 [例如戰爭期間的避難所提供食物和棉被]。同時也具有「積極接待」(hospitalité positive) 的面向, 能促進新來者對空間的使用權、行動能力和表達自由, 並為其公共領域的發展與參與創造有利條件 [例如咖啡館的開放性有利交流討論與資訊傳播]。此外, 「場所」的空間性具有以下兩項特點:

一、**定位性 (emplacement)**: 這種空間限制不只是物理上的, 也涵蓋概念上的討論邊界, 它決定了哪些觀點、內容可以被納入討論中、哪些應被排除, 以及場所如何塑造與制約討論者的行動與交流方式 [例如學術研討會被定位為學術人員的聚會, 並規範討論主題與使用語言]。

二、**框架性 (encadrement)**: 交流並非隨意發生的事件, 而是由機構, 如沙龍、咖啡館、俱樂部組織並加以規範的社交場合。參與者需要遵守其中適當的行為模式, 以符合活動的流程與社會習禮 [例

如咖啡館中讀書會的秩序與規範：導讀人管理發言順序，書友遵守互動禮儀] (Berger, 2018: paras. 22-31)。

另一方面，作為市民參與公共生活的空間，場域確實關注其周遭環境，並關心外部社會。即便如此，場域內的議題選擇仍受內部關切的焦點所過濾，內部的關切與反思構成了其關注外部世界的基礎。這種選擇性的注意力，使場域能夠將外部事件重新構建，從而符合自身脈絡的議題，以便建構內部共享的價值、權力平衡與秩序。換言之，對外普遍適用的真理與內在視角的多樣觀點，必須能夠相互協調，理性溝通不僅要求談話者具備抽象思考的能力，還要能夠根據所處環境做出適切行動，這種能力稱為與環境互動的「生態理性」(rationalité écologique) (Berger, 2018: para. 43)。⁶

至於符合生態理性的議題討論如何達成其最佳的外溢效益，能否促成真正具有政治能量的公共性，則取決於溝通模式的選擇。哈伯瑪斯認為，若議題的建構與討論是透過日常的面對面交流或公共示威活動，那麼便屬於公領域中兩個較小規模、相近的互動圈，雖具有凝聚力，其影響卻相對侷限。倘若能在大眾媒體的監督下，將這些分散的討論轉化為可見且持續的公共傳播，就有機會累積成有意義、具強度的公共輿論，進而對政治決策或社會變革產生實質的影響。因此，哈氏在分析新舊媒體轉型時，特別強調媒體在「處理與傳播訊息的過程」(throughput) 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Habermas, 2023: loc. 106)。

⁶ 貝爾熱認為，為使「溝通理性」(rationalité communicationnelle) 不至於抽象空泛，溝通就必須根植於具體的生態與社會情境中，也就是在「生態理性」的基礎上才能夠發展。溝通互動不能「脫離土壤」(hors sol) 獨立存在，必須與其所發生的環境或社會場域保持實質接觸。這也回應了 George H. Mead 於《心靈、自我與社會》(*Mind, Self and Society*, 1972) 所主張的：人的自我與心靈是在與他人的互動與社會環境中逐漸形成的 (Berger, 2017: 101)。

傳統上，這一過程由具有專業素養的寫作者、編輯者與管理者共同維持，亦即「守門員」(gatekeepers)，他們不僅決定議題的涵蓋範圍，也把關討論的理性品質，使公共溝通具備可辨識的深度與方向 (Habermas, 2023: locs. 107-108)。更明確地說，媒體內容的選擇與呈現，受以下五層次因素影響：一、**個人層級** (the individual)：編輯者的價值觀與判斷；二、**作業慣例** (media routines)：媒體日常操作的慣例、工作流程、內容安排模式；三、**內部組織** (organization)：人員結構、管理方針與組織文化；四、**媒體對外關係** (extra-media)：公眾需求、市場導向、社會責任；五、**社會體制** (social system)：整體社會組成、政治制度與文化環境。簡言之，媒體的編審與傳播過程，並非單純由結構 (制度、社會力量) 所決定，也不是完全由個人 (編輯、使用者) 的選擇主導，而是兩者交互作用的結果 (Shoemaker et al., 2009: 81-82)。然而，隨著網路社交平臺的興起，新媒體逐漸剝離了過去守門員的角色，人人皆可發布訊息，這使得公共性更仰賴發言者的理性辯論能力 (Habermas, 2023: loc. 109)。正如德國社會學家雷克維茨 (Andreas Reckwitz) (2017: 244-250) 指出，當個體愈加強調在社群媒體上展現自身的獨特性，並由理性溝通的討論性主體，轉變為以私人情感與可見性為主的表演性主體時，公共發言將不再以說理為中心，而以吸睛、表態與展演為要，使得社會進入高度個人化的狀態。

回顧歷史的變化，可以看到「公」與「私」領域邊界的不斷位移，以及「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動態關係。這些變化突顯了文學公共領域的生成條件、討論內容與理想的交流模式，同時，也說明了場所環境對溝通內容的影響，以及媒體生態對公共討論帶來的挑戰。若將此置於文學公共領域建構的視野中，可以思考以下問題：公共空間的環境及其中的人際互動如何影響文學作品的生成

與在文學場域中的位置？這種公共性又如何透過作品體現，成為公共討論的素材？而文學作品又是如何透過媒體傳播，拓展其在公共領域中的流通？鑑於此過程涉及多層次的動態關係，本文將以酒吧、咖啡館為空間案例，沙特的小說為實踐作品的分析，以及《摩登時代誌》為期刊媒介，三個組成維度來探討文學公共領域的建構(如下表 1)。此分析框架不僅有助於揭示文學公共領域的結構特徵，還能進一步理解其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尤其是文學如何成為引發公共思辨與社會互動的重要載體。

表 1 「文學公共領域」的組成維度

文學公共領域	
空間維度	場所的内部接待性 (積極與消極面向) 場所的外部環境場域性 場所作為文化象徵與意識形態的表徵
實踐維度	作者作為公共行動者的書寫實踐 文本中私人經驗的公共轉化 作品對讀者的倫理召喚與主體觸發
傳播維度	傳播環境：支持公共討論的社會文化條件 傳播內容：透過媒介傳遞並承載文化意義的資訊與符號 傳播策略：透過計畫性溝通影響受眾以達成使命與目標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肆、文學公共領域視域下的存在主義文學的生成與發展

一、文學生成的場域：

公共空間的組織功能與文化符號的形塑

文學公共領域的構成，除了關涉文本的內容與傳播媒介，也包

括與之相應的社交空間，這些場所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呈現出本質上的差異。十九世紀的文學活動主要圍繞著貴族、資產階級沙龍或各私人會所，它們是作家建立職業生涯的重要場所，聚集了各流派的文人雅士。但隨著出版業日漸專業化，貴族與上流社會的文化影響力下降，到了一戰之後，文學界的社交活動已不再圍繞傳統沙龍，而是轉向與文學網脈更直接相關聯的文學機構，也就是雜誌辦公室、書店、出版社等，並以此為中心，形成周邊的聚會場所 (Bandier, 1992: 112)。這種傾向到了二戰之後益加明顯，聖日耳曼德佩區以文學機構的數量優勢與藝文傳統（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十月文藝團 [Groupe Octobre] 的聚集地）承接了由蒙帕納斯車站區 (Gare de Paris-Montparnasse) 移轉過來的巴黎藝文中心，街區的咖啡館（如雙叟 [Café des Deux Magots] 與花神 [Café de Flore]）成了文人相聚的地點。與此同時，文學界進入了商業化時期，快速獲取出版品的評論與爭奪文學獎成為核心業務。出版社為了進入媒體市場，選擇了最經濟的方式：將作家轉變為評論家，或讓評論家擔任叢書主編。這種評論、寫作與出版的交錯關係，最終使作家也轉變為叢書主編 (Matonti, 1992: 110)。作為法國最大文學出版社，加利瑪 (Éditions Gallimard) 每日人流往來頻繁，業務量促使交流的必要性增加，社交空間的需求量也因而大增。即便像「皇家橋酒吧」(Bar du Pont-Royal) 那樣並非為文人書寫而設置的公共場所，也因鄰近出版社而匯集了藝文人士，成為新型態的「接待性」空間，因其社交性質提供了開放且流動的人際網路（位置如圖 1）。

空間的接待功能不僅來自於建築本身的設計，還受到社會互動需求的影響。往來加利瑪出版社的作家、評論家與出版人之間的頻繁接觸，使得皇家橋酒吧因鄰近出版社而成藝文人士聚會的場所，

儘管酒吧的設備條件不利於寫作，但其溫暖與寧靜的氛圍仍吸引作家們來此聚會與討論。從貝爾熱的接待理論來看，酒吧不只是單純禦寒的庇護所，它位於地下室的隱密性，也為戰後已有名氣的波娃提供了一個不被打擾的工作空間 (Berger, 2018)。即便原本的空間設定不符合需求 (木桶桌不利寫作)，場所的地利之便與環境氛圍仍為使用者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也是在此「積極接待性」的空間功能下，波娃結識了未來的工作夥伴：「想要閱讀與討論的人會來聖日耳曼德佩區，我就是在皇家橋酒吧遇見維昂 [Boris Vian] 的。他在加利瑪有份手稿正在審閱，而格諾 [Raymond Queneau]⁷ 對這份手稿十分欣賞」(Beauvoir, 1963/2014: loc. 103)。格諾是《摩登時代誌》創刊初期的編輯，而維昂不久後也加入團隊，為雜誌撰寫了數篇帶有諷刺與黑色幽默的政治評論，並發表了成名作《泡沫歲月》(*L'Écume des jours*, 1947) 的章節片段。酒吧的開放性與偶然性促成了文化生產，而新興作家的反叛精神與實驗書寫風格，也為雜誌在文學場域中建立起有別於傳統刊物的前衛性定位。

尤其戰後書報解禁，加上社會對新思想的渴求，使得稿件需求大幅上升，文化領域亟需注入新的觀點與聲音。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資訊流通加速與媒體發展，作家的角色不再是孤立的創作者，而需要主動經營與文壇的連結，並透過人際網絡拓展出版與合作機會。相應地，公共空間 (如酒吧、咖啡館) 在文學世界中的功能也產

⁷ 格諾受語言學與數學的影響極深，是「潛在文學工坊」(Oulipo, 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 的創始成員之一，設計基於數學問題的新寫作手法。1947 年發表的成名作《風格練習》(*Exercices de style*) 用 99 種不同文體重新敘述一個平凡男子搭公車的故事，被視為潛在文學精神的前身，尤其強調在語言限制中發掘創造力，並挑戰傳統敘事方式。

生質變，不再如十九世紀那樣僅作為小圈子排他性的進入門檻，將作家被動地納入某特定群體；反而因空間的對外連結度與社會滲透性，成為作家積極參與出版事業與文化生態的重要平臺，如下段波娃寫到：

我為《摩登時代誌》收集了一些資料，並與一些人接洽。之後，我與康諾利在雙叟咖啡館碰面。他是英國雜誌《地平線》[*Horizon*] 的總編輯，這本雜誌在戰爭期間刊登了許多抵抗運動作家的作品……他跟我談論起英國文學的新趨勢，還有當前住在倫敦的庫斯勒 [Arthur Koestler]。(Beauvoir, 1963/2014: loc. 35)

本文理論部分曾指出，溝通與互動不能脫離土壤獨立存在，必須與其所發生的環境或社會場域保持實質接觸 (Berger, 2017: 101)。作家的職業發展亦然：當其任務從純粹的文本生產，轉向積極參與出版決策與文化方向的塑造，是否能融入出版生態系統，並在其中建立有機位置，便成為作家能否持續發聲與立足的關鍵。在這樣的條件下，咖啡館這類對外開放的場所，成了波娃聯結文壇資源的重要節點——她在此獲知歐美文學動向、結識新銳作家，並尋找潛在合作對象，從而豐富文勘資源。此場域功能正與存在主義強調行動與世界關係的觀點不謀而合。沙特在《摩登時代誌》創刊宣言中強調：人的存在並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嵌入其所處的社會、歷史與全球脈絡之中；個人的行動不僅影響自身命運，也對整個世界負有責任 (Sartre, 1945: 5)。因此，《摩登時代誌》的選文不僅關注法國情勢，也刊登英美作家的作品。除了梅洛－龐帝曾撰文批評引文中庫斯勒的作品外 (Beauvoir, 1963/2014: loc. 178)，常流連於花神咖啡館的非裔美國作家理察·賴特 (Richard Wright)，也是期刊關注的焦點。波娃在自傳中提及：「在花神咖啡館，我找到三本

厚重而精美的美國書籍，從中我們選了幾篇賴特的文章，準備刊登在八月號與九月號上」(Beauvoir, 1963/2014: loc. 138)。由此可見，無論是花神或雙叟咖啡館，它們開放的空間性與人流的多元性皆有助於歐美觀點的相互滲透與對話，進而影響誰能進入文學公共領域、參與範圍，以及哪些立場能夠被討論、批評或接受。而這種空間所具備的對外場域功能，不僅體現在跨文化的日常接觸上，也使場域中的行動者得以將文化交流的結果，具體轉化為出版與發表的實際行動。

除了人際的社交功能外，咖啡館也是個人獨立的創作空間，與場所本身的物質接待性有關，尤其在物資匱乏的二戰時期，咖啡館的集體庇護功能尤為顯著。關於戰時常在花神咖啡館寫作的作家們，經營者的口述紀錄如下：

大約在 1942 年，我在花神咖啡館注意到一位先生，他每天從開店待到中午，又從下午待到打烊。他經常與一位女士同行，但兩人通常分開遠坐在不同的桌邊。雖然如此，若是在樓下，他們總是待在同一個角落。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他是誰。下午在咖啡廳的樓上，總能看到他們帶著一疊厚厚的文件，埋頭寫個不停。許多個月過去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直到有天，我接到一通電話，來自我個人的一個朋友，他戲稱自己為沙特，我跟他說店裡沒這個人。然而，他再三堅稱，沙特先生確實在店內。於是，我決定去喊這位「沙特先生」。結果，只見我們偉大的尚－保羅起身，對我說：「我就是沙特。」從那一刻起，我們成了朋友，早上經常聊天。後來，打電話找他的人越來越多，我覺得有必要特地為他裝一條專線。(Vian, 1951/1997: 84)

1942 年的巴黎正值德國占領時期，宵禁與資源短缺使人們的行動受限，公共空間的接待性促成作家的棲身與創作。引文中的沙

特與一位女士（波娃）選擇在較不被打擾的咖啡廳二樓長時間寫作，這不只是因為現實條件的限制——沙特長年租屋於旅館的雅房，供暖與食物補給困難，直到 1946 年搬入母親公寓，才擁有固定住所與書房——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咖啡館裡。咖啡館的消極接待性允許使用者保持一種隱匿的狀態。在數個月內，沙特與同行者的身分始終未被確認，無須顯示身分便可自由進出。此點體現了公共空間接待的匿名性和自主性——即提供最基本的底護，卻不干涉個人的自由。然而，當電話來尋找「沙特先生」時，他終於以自己的身分現身，這標誌著他從匿名接受空間的消極接待，轉向積極參與其中。自此，沙特不僅成為經營者的朋友，還成為這個場域的「主人」之一，有所屬專線，能與更廣泛的知識社群建立聯繫，推動其文學與哲學事業。固定的據點有助於集結、組織所屬群體。花神作為存在主義文學家的思想交流、行動發起與動員的中心，顯示沙特影響力已滲透到空間的運作之中，體現了空間接待的反向性：從最初被空間所接納，到最終反過來影響並改變空間，使之成為自身理念的延伸。

如果上述幾段引文強調的是空間作為一個中性或空白地帶，展現其物理上的開放與接待性，包括公共空間的地理分布及使用者在其中參與的行動發展，這些討論較聚焦於功能層面。但若進一步來看，我們也可以從更深層的文化與歷史角度來思考空間的使用與個人歸屬之間的關係。正如下文所引，沙特在接受維昂訪談時，對於戰時光顧花神咖啡館的理由說明：

蒙帕納斯區的多摩咖啡館因供暖不足，冬天極為寒冷，難以久待。從拉斯帕伊大道翩然到來的灰老鼠背著一袋袋茶葉、奶油、果醬與白麵包。這種不平等的物資分配讓人無法忍受。再加上附近的瓦萬地鐵站關閉，交通不便。相形之下，花神咖啡館因

其暖爐、無德軍駐留、地鐵也正常運行，去那裡的人歡快愉悅，散發一種俱樂部般的氛圍，讓人不加入都難。(Vian, 1951/1997: 88)

公共空間的「接納能力」(*épreuve de réceptivité*)，不僅取決於場所功能，還涉及場域文化與歷史背景，而對特定的人物或言論產生敵意或拒斥反映 (Berger, 2018: para. 53)。換言之，接納來者的場所「並非一個淨空的表面，而是一個已充滿生命的空間」(para. 40)。引文中「灰老鼠」(德軍) 流連的蒙帕納斯車站區，是二戰前的巴黎藝文中心，當地的咖啡館如「多摩」(*Le Dôme*) 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名流、藝術家。此區被敵軍占領的事實，成了民族傷痛，並帶來社會緊張感；物資的不平等分配，更突顯出戰爭剝奪與壓迫。這些因素使得與區域連接的多摩咖啡館承載了消費者不安的情緒與敵意，讓人難以久留，呈現出「低接納能力」的狀態。與之相比，沙特眼中「讓人不加入都難」的花神咖啡館，它的「高接納能力」不單純源自交通便利、庇護性佳與冬季供暖，更取決於參與者的所屬社群與聖日耳曼德佩區居民的身分結構。事實上，在法國解放前 (1944 年)，此區仍是一個寧靜的小村落，居民多為工匠、小商販與退休人士。雖然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已陸續遷入，但尚未引起廣泛關注 (Schlessner, 2014: 12)。這樣一個集結的社群，在內部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對外展現出一種隱形的抵抗力。當偶有落單的德軍進入咖啡館時，往往很快感受到不受歡迎的氛圍，因而迅速離開。也因此，作為「生物棲居地」(Berger, 2018: para. 40) 的咖啡館，宛如小村落的生態社群，其氛圍形成了一道隱形的屏障，不僅與外界隔離，保護著其中的成員，也在無形中過濾外來訪客。

聖日耳曼德佩區的「小村莊」風光一直延續到 1945 年 10 月，沙特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L'existential-*

lisme est un humanisme)，該區的文化熱潮才真正燃起，引發世人關注 (Schlessner, 2014: 12)。尤其在德國占領期間 (1940 年至 1944 年)，人民行動、日常補給與訊息流通都受到了限制，反而強化了社會對自由、責任與個人主體性的意識，使文學作品與思想表達被賦予更強的社會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咖啡館與地下酒吧等場所成為人們生活、交流訊息與討論哲學思潮的熱門場所。作為文人聚集之地，花神、雙叟等咖啡館透過日常對話、文本創作與出版網絡，發揮了文學公共領域的功能，讓存在主義文學超越個人書寫，轉化為公共討論的核心。如《週六夜》(*Samedi-Soir*) 周刊等媒體對聖日耳曼德佩區的持續報導與渲染，該街區在戰後逐漸與沙特風潮合而為一，進而被塑造成「存在主義」的文化象徵 (Cohen-Solal, 1999: 446; Lecoq, 1992: 3782-3784)。一方面，它回應了戰後社會對自由、責任與主體反思等時代精神的期待；另一方面，其文本與思想生產也並非孤立進行，而是深植於特定文化空間中；這些空間不僅承載著自身的社會與歷史意義，更因媒體的再現與渲染，被賦予象徵性的能量，進而強化了存在主義在文學公共領域中的影響力。

本節借鑑社會學者貝爾熱提出的「接待及參與理論」(Berger, 2018)，從功能性與象徵性的層面，探討了酒吧與咖啡館作為公共空間的意義。在具體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中，這些場所展現了其接納多樣角色的潛力，以及與外部社會互動的可能性。文化歷史所形塑的歸屬感，也使這些空間承載了特定的象徵價值。場所的地理位置與物質條件 (如裝潢、氛圍與設備) 不僅反映出文學創作者的創作需求，也折射出其所處的社交網絡與可動用的文化資源。同時，場域的對外連結性與社會滲透能力，則進一步影響創作者在文化場域中的角色定位，並決定其是否具備移動與轉換場域的可能性。例如，沙特對花神咖啡館的策略性使用，不僅是創作的實踐場域，也是一

種場域位移的籌碼。當作家的個人形象與公共空間產生連結時，這樣的連動也有助於其社會形象的建立與傳播。在此基礎上，下一小節將從具體的文學文本出發，延續空間與創作實踐之間的思考。我們將進一步探討：作家如何在作品中交織個人的私人性（如情感、記憶與思想）與公共性（如社會與政治關懷），並透過創作實踐展現主體的反思與回應。分析不僅聚焦於小說內容本身，更關注作品背後的歷史條件與書寫策略，特別是咖啡館作為創作空間，如何影響文學表達的形式與內涵。

二、文學實踐中的公共性：

從創作者空間到讀者主體性召喚

在咖啡館裡創作，並非存在主義者首創的空間使用方式。早在十八世紀，普羅柯佩咖啡館 (Café Procope) 已是百科全書派 (Les Encyclopédistes) 哲學家的聚集地，包括狄德羅、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都在此會晤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攜手撰寫跨學科的百科全書 (Letailleur, 2011: loc. 60)。到了十九世紀，即便拉丁區人流紛雜喧鬧的咖啡館並非常態的創作空間，仍有不少波希米亞風格的作家因為住房條件不佳等因素聚集在咖啡館。⁸ 到了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此傳統更由超現實主義者 (Surréalistes) 和十月文藝團所繼承。布列東 (André Breton) 領導的超現實主義者聚集在雙叟咖啡館，而普維 (Jacques Prévert) 率領的十月文藝團則以花神咖啡館

⁸ 十九世紀法國作家 Jules Champfleury (1872) 在《青春素描與回憶》(*Souvenirs et portraits de jeunesse*) 中寫道：「事實是，直到 1848 年為止，我們的書房其實更像是設在那些好客的咖啡館裡。每天早上 9 點，一夥人懷著極大的熱情湧入，一直到午夜才離開。有人閱讀，有人玩牌，也有人隨興寫作。然而，當福舍里 [Fauchery] 有一天大張旗鼓地把整套書寫工具搬來，準備專心從事日常寫作時，現場的震驚可想而知」(122)。

為活動中心。其後，沙特帶著「存在主義家族」(Cohen-Solal, 1999: 454) 進入其中，進一步改變了咖啡館作為文化空間的性質與社會意義。具體來說，倘若十月文藝團透過集體交流與創作，為咖啡館注入一股前衛、詩意、帶有嬉戲與抵抗色彩的藝術氛圍，它仍然屬於一種帶有藝術氣息的文化反叛，與波希米亞創作傳統較為相似，而沙特的文哲創作則更為激進與顛覆：「當一個人再也無法對任何事情無動於衷，當整個世界都裝在他腦子裡時，怎麼還寫得出優美的書？」(Sartre, 1947/2017b: 4)。這話點出了他創作中無法抽離的倫理焦慮與現實負擔。若說寫出「優美的書」需要某種抽象距離與審美的抽離，那麼沙特的寫作則選擇直面時代的重量。他不僅在作品中挑戰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傳統倫理與家庭秩序（如墮胎、不婚、開放式關係等議題），更透過小說與劇作介入社會論辯，形塑出帶有公共性特徵的文學書寫。

沙特在《存在與虛無》(*L'Être et le Néant*, 1943) 中寫到：「可以確定的是，咖啡館本身，連同其顧客、桌椅、長椅、鏡子、燈光、煙霧瀰漫的氛圍，以及充斥其中的談話聲、瓷盤碰撞聲與腳步聲，共同構成了一種盈滿的存在。而我所感知到的每一個細節，也都充滿了這些氣味、聲音與色彩；這些現象都具有一種超越其樣貌的存在」(Sartre, 1976/1994: 44)。換言之，咖啡館是一個被無數細節填滿的感知場所。在其中，人的意向、注意與期待會重新組織眼前景象的意義；也正是在這種盈滿的存在中，缺席才得以顯現。這是何以相較於習慣在私人領域中內省書寫的作家，沙特選擇置身於公共空間，透過感官的開放與對外關注，培養對公共性與社會脈動的敏銳感知，展現出作家不逃避現實、不封閉自身，而是介入社會的立場。

對他來說，寫作不僅是個人內在的探索，更是一種連結城市與世界的行動實踐。正如他在紀錄片《沙特的自我闡述》(*Sartre par lui-même*) 中所言：「我想站在街頭作證，因為我是知識分子」(Astruc & Contat, 1976)。此話不僅道出了沙特的自我定位，也反映了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不應脫離現實，而應親身參與社會，觀察並記錄其變遷。咖啡館作為一種微型的社會，凝縮了不同的階層、性別與族群，為沙特提供了一個觀察社會變遷的有利據點。在這樣一個充滿流動性與多樣性的場所中，世界處於持續變動與重構的過程。沙特正是在這樣的寫作環境中，發展出其核心哲學命題：「存在先於本質」(*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亦即人並非透過固定本質來決定命運，而是透過一次又一次在具體情境中有意識地選擇與行動，不斷重新定義自己。

倘若創作空間與作家的關係並非單向支配，而是一種雙向互動，那麼我們就必須考慮：作家往往因理念、政治處境或歷史條件，主動或被動地選擇某特定空間作為創作場所；而這些空間的物質條件、文化記憶與社會氛圍，反過來也滲透至作家的作品中，形塑其風格與思想脈絡。這種由時空條件構成的感知與思考方式，影響了沙特對小說藝術的理解，特別體現在他對敘事技巧的反思上。在《文學是什麼？》(*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1947) 一書中，沙特指出戰後小說的敘事邏輯與戰前已有根本性的差異。戰前的社會相對穩定，人們仍相信秩序、理性與普世價值，因此小說可以從一個相對超然的位置建構世界；但戰後的現實卻是激烈變動且難以確定的，人們只能體驗到現象的相對性而非絕對性。因此，小說家不能再將自己置身於一個歷史演進之外，以全知視角俯視真理，而是被迫深入歷史與社會的激流之中 (Sartre, 1947/2017b: loc. 258)。如此觀

點廣泛運用於創作之中，特別是長篇小說《自由之路》三部曲（前兩部於 1945 年出版，第三部於 1949 年）。

以第二部《緩期執行》為例，書中各人物被置於 1938 年歐洲的真實歷史事件中，這些事件推遲或醞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包括法國的徵兵與軍隊調動、因政治壓力與對納粹的忌憚而簽署的西班牙內戰不干涉協定、慕尼黑會議 (la Conférence de Munich) 中針對蘇臺德問題 (Sudetenland Crisis) 對德的綏靖政策、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以及在戰爭陰影籠罩下各階層人民因局勢不明的恐慌等。沙特透過去中心化多重視角，使敘事不再圍繞單一主角，展現多重視角並行鋪排的結構，以此強調各角色的相對關係，試圖打破傳統敘事的中心化模式。例如，針對蘇臺德問題，相關段落以下為起始：

18 點 10 分，德國哥德斯堡。老者在等候。在法國安古蘭與馬賽、比利時的根特與英國的多佛港，大家都在想：「他在做什麼？他下來了嗎？他在和希特勒談話嗎？或許就在此時，一切都正由他倆決議處置。」然後，他們繼續等待。(Sartre, 1945/2017a: loc. 32)

此段落開頭確立了文本的多視角敘事風格，表明讀者不應僅從老者 (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的觀點來看待他與希特勒的交涉。因此，在簡短描述張伯倫的視角後——窗外山水風光、情緒不安打嗝所導致的口中酸楚感，以及白晝的燥熱氣候 (Satre, 1945/2017a: loc. 32)——便以不分段的方式，直接跳接至下一場景：

1938 年 9 月 23 日的下午五點十分，法國胡安－雷潘濱海區，一位身穿白布衣裙的豐腴女人坐在摺椅上，摘下藍色墨鏡，開始閱讀報紙……她專心注意才讀懂副標：「張伯倫致函希特勒。」她不禁想道：「我**真的**如此厭惡戰爭嗎？」然後她自忖：

「不，不，沒那麼徹底」。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她就會一躍而起，奔向車站，張開雙臂大喊道：「你們不要走，待在家裡！」……隨後，她覺得自己根本做不出那種出格莽撞的行為，鬆了一口氣。沒那麼徹底。她是個好女人，一個低調、講理的法國女人，心中有眾多規範，其中一條就是：凡事不要想得太徹底。(loc. 33，粗體為原文標示)

從形式而言，敘事的跳接手法使各場景顯得較為碎片化，尤其是在過渡處僅以簡略的人物與時空描述來區隔前一場景——甚或在一些篇章中省略時空參照，直接依主題需求，將不同時空背景的人物並置在同一段落中——而造成讀者的理解斷層。不過，這種敘事方式的優點，在於它能呈現不同階層、性別或國籍的人物在空間中的相對關係，並根據各自的位置與步調，衍生出不同的行動與觀點。其次，媒體傳播的發展（其他章節亦涉及交通與通訊技術）進一步加速了空間邊界的解構，使敘事得以輕易跨越地域界限，呈現出不同空間背景的人物對媒體的接收、詮釋與行動回應，進而形塑出社會集體對歷史事件的多元觀點與整體認知。這樣的敘事結構不受固定的空間邊界限制，各場景之間的轉換無明顯的區隔，體現出當代小說的流動性與非線性特徵，不同於傳統小說的敘事穩定性與因果推進模式。

從內容意涵來看，將歷史事件與個人經驗並置，形成敘事的同步性，藉以堆疊、推展高潮，事實上有利於突顯人類在面對沉重的歷史時，內在的脆弱、無知與懈怠。公私領域的界線在此段引文中，顯得相當模糊。其中寫到，戰爭前夕南法的一個濱海小鎮，一位體態豐腴的中產階級女子在沙灘上曬太陽，面對當前局勢，以「凡事不要想得太徹底」(Sartre, 1945/2017a: loc. 33)，來享受暫時的逃逸——逃避戰爭，也逃避自我責任。然這一切並不是無意識的，而是

有意識地壓抑自身主體性。沙特認為，意識是一種「沒有根據」(sans fondement) 的存在方式：它無法訴諸任何固有本質來解釋，因此人唯有透過不斷的選擇與實踐，才得以為自己的存在賦予意義。否則，意識將傾向掩蓋自身的「虛無性」(néantisation)⁹ (Sartre, 1943: 128)，以逃避自由帶來的責任與焦慮，進而陷入「自欺」(mauvaise foi) 的狀態，亦即無視於人存在的開放性與未完成性，而將自身單純等同於自己的過去、社會角色與現實狀態。

如引文中的中產階級婦女，她拒絕思考、檢視自身的價值判斷與選擇的依據，而是以階級、性別角色為理由來說服自己，掩蓋做決定的必要性，使生活像是被安排好、受到「命定論」(déterminisme) 的規範。哪怕戰爭與歷史的陰影早已滲透至她的身體經驗與情感衝突之中，她仍藉「自欺」的方式壓抑內在的焦慮，彷彿如此一來便可逃避所需面對的自由與責任。而實情是，私人經驗從未脫離社會情境，而是政治局勢的結果、歷史變局的映照。她必須面對親友即將前往戰場的命運，並繼續說服自己情勢所逼。如同一戰時父親戰死沙場、兄長瘸了一條腿，人們跟她說「這樣很好」，她確定這一次也會很好 (Sartre, 1945/2017a: locs. 33-34)。然而，她是否真對自己的不幸毫無意識？若從另一角度來看，低調維持中產階級體面的形象，本身也是一種選擇——一種不願意、也不敢過度直視不幸的選擇。不幸總以各種樣貌存在於不同的私人經驗中，她的人生並非特例。她只是跟多數人一樣，選擇了一種非真實、卻極具形式感的生存方式，把痛苦收納於重複日常的背後，用體面的外表、節制

⁹ “néantisation” 並不只是意識對事物的否定，也代表著「**自為存在**與**自在存在**之間的原初關聯」(la liaison originelle entre l'être du pour-soi et l'être de l'en-soi)。意識的存在方式，就是藉由否定**自在存在** (l'en-soi) 來顯現自己是一種開放、未完成、可變的存在，也因此它無法訴諸任何固定的本質或根據 (Sartre, 1943: 128，粗體為筆者標示)。

的語言、冷靜的行事來包裹災難。這種選擇性的忽略，使人看來依舊屬於正常社會成員的一分子，得以繼續面對生活中的瑣事，而不是崩潰、解體、或對抗一切。

因此，與其說《緩期執行》的主題是戰爭與和平的二元對立，不如說是在歷史情境的重壓下，私人性在面對公眾事務的評判選擇時，展現出多重而矛盾的樣貌。沙特拒絕任何預先設定好的規範體系，這種體系會以「遺傳、社會影響或其他某種機制」來決定人物的行動 (Sartre, 1947: 35)。除了前述資產階級女性的例子外，無產階級的集體同一性，也屬這種預設行動規範的體系。以下以共產黨員布呂內 (Brunet) 針對工人舊識莎莎特 (Zézette) 與莫里斯 (Maurice) 的對話回應為例，進一步說明：

「我不知道戰爭會不會爆發」，布呂內說。「但我們千萬不能害怕：工人階級必須明白，做出讓步是無法避免戰爭的」。他真能言善道，莎莎特抬起眼來看著他，眼神中充滿信任，嘴角一抹溫柔的微笑。莫里斯卻感到惱火，布呂內說的不過就是報紙上那些，其他什麼也沒有。

「如果我們不甘示弱地給希特勒點顏色瞧瞧，你認為他就會退讓嗎？」莎莎特問。

布呂內擺出一副官方的神情，似乎不明白別人是在問他的個人看法。「那完全有可能」，他說。「再說，不管發生什麼事，蘇聯會和我們站在一起」。(Sartre, 1945/2017a: locs. 20-21)

布呂內的發言：「工人階級必須明白，做出讓步是無法避免戰爭的」乍聽之下意志堅決、理直氣壯，但如莫里斯所感受到的那樣，「不過是報紙上的那些」，其中毫無個人觀點。這樣抽象的語言排除了具體處境的複雜性，僅就黨派的立場出發，以集體敘事取代個體選擇，壓抑了主體對困境的猶疑與思辨。尤其是在莎莎特與莫里

斯展現他們的私人性感受——如焦慮、不安、甚至希望獲得個人層面的理解與回應時——布呂內依舊以意識形態來掩飾焦慮：「不管發生什麼事，蘇聯會和我們站在一起」¹⁰，彷彿政黨意識的結盟是一種自動運行的保證。這種態度的背後，事實上隱含著對個體自由的不信任，以及對自身主體性的漠視：他無需對黨內結構與話語進行自我反思與批判，而僅僅重複其立場，成為一個被意識形態驅動的傳聲者。

相較之下，莫里斯對戰事論述的質疑，使他始終處於選擇與責任的緊張感之中，在不確定中掙扎，試圖為自己的行動找尋意義。因此，當他面對黨內高層布呂內宣揚的信條時，內心不禁產生疏離與失望。事實上，對集體說法產生懷疑的私人性感受，正是主體性生成的起點與契機。它不只是情緒上的不適或迷惘，更是一種倫理上的覺醒。當個人原本信仰的價值不再能安慰或指引他，他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是誰、為什麼要行動、能不能不服從。由此來看，私人經驗並不是退回內心的避風港、書寫個人情感日記，而是與外界連結。其中的條件是讓主體開始做出判斷、看清自己在社會與歷史中的角色與責任。正如沙特所言，作家的任務，即是揭露那些被集體話語壓抑的私人經驗，使主體從沉默中甦醒，面對現實並作出選擇，意識到自身的行動自由與倫理責任 (Sartre, 1945/2017a: loc. 33)。

¹⁰ 對話的背景發生在 1938 年 9 月，而蘇聯與納粹德國於 1939 年 8 月 23 日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Molotov – Ribbentrop Pact)，兩國承諾互不攻擊，並有一項秘密附加議定書，瓜分波蘭與東歐勢力範圍 (Sapir, 2021)。此舉對法國共產黨造成了深遠且劇烈的衝擊。1939 年 9 月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對德宣戰，法國政府旋即以「配合敵人、危害國安」為由，宣布取締法共，禁止其刊物《人道報》(*L'Humanité*)，黨員遭到逮捕、罰款或監禁 (Grenard, 1993; Poulhès, 2017)。

這種倫理上的召喚，構成沙特「介入式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 的公共性實踐。其寫作宗旨在於激發讀者的政治覺察，促使其對現實世界負起行動的責任。這種文學涉及的「政治性」乃是由內生成，而非由外制約，因為它不在於服務特定政黨或意識形態，而是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與道德責任。¹¹「私人性」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顯示其價值：個體在面對政治壓力時，透過自由意志與選擇權的行使，展現出自身的倫理主體性。這意味著當個體在私人層面進行反思或做出行動選擇時，也正在進行一種政治性的實踐。如上引文所述，在二戰一觸即發的背景下，「是否對戰爭感到恐懼」這一問題反覆出現在角色之間，以自問或向他人提問的方式，構成小說的母題。其中各觀點的交錯與並置，體現出各別倫理抉擇的不確定性與動態過程；而各自認知上的差異與侷限，也反映出各別的道德立場與偏向性。敘事者並未直接評價人物行為，僅形構出文學中政治話語空間的複語性 (*hétéroglossie*)，並將此交由讀者自行思辨與詮釋。這樣的敘事結構將公共議題與私人經驗連結起來，使歷史滲入文學書寫之中，同時又讓文學反過來介入現實。這不只是一種技巧性的安排，更是一種召喚倫理行動的寫作手法，不預設立場，卻處處誘發讀者在差異中做出判斷與自我覺知，也正是沙特所稱的「實踐式文學」(*littérature de la praxis*) 的特點：一種以小說為場

¹¹ 沙特認為，一旦文學被要求為某世俗的政治、經濟、宗教權力服務，並在作品中傳達其思想，那麼作家的創作將不再是自由的表達，而成為傳達某意識型態的工具。沙特將這種情況視為「文學的異化」(Sartre, 1947/2017b: loc. 179)。它無法真實反映作家的內心世界和人類的自由，只能表達單一的、受限的觀點，這樣的文學就會失去獨立性和創造性，而與文學內在的政治性話語空間的特質背道而馳——它應是批判、複語、多層次與動態演進的。

域，讓歷史在閱讀中被重構與思考的公共行動 (Sartre, 1947/2017b: loc. 274)。¹²

由此來看，無論是哈伯瑪斯透過公共討論促成理性輿論，還是沙特透過閱讀召喚、生成讀者的主體行動，他們都試圖以藝文作品為媒介，引導群眾思索當代議題，形塑一個具變革性的公共領域。二戰後的存在主義文學，不僅是思潮的表現，也是文化、哲學與社會問題的交會點。情境化的私人情感表現與存在主義欲探討的自由與歷史條件的拉扯、責任與選擇之間的相結合，在脈絡化的語境中激發讀者對社會議題的深刻反思。這種哲學運動與文學推廣的結合，使文學不再僅是審美對象，也深化了其作為社會實踐的可能。然而，這樣的協力合作若缺乏適當的傳播機制與媒體支持，亦難以達到實際的社會擴散效果。因此，下一章節將進一步探討：什麼樣的傳媒模式能夠活化批判性的公共領域？此一模式在推廣文學公共領域中扮演什麼角色？它又如何形塑社會議題與文化走向？

三、從《摩登時代誌》看文學公共領域的媒介條件： 反思社交平臺時代的公共性困境

面對社交平臺時代逐步瓦解的傳媒秩序，哈伯瑪斯重申，公共

¹² 沙特強調，所有的寫作企圖最終都將歸結為一件事：參與歷史、創造歷史。他認為，作家的任務不該只是描寫「存在的狀態」(l'exis)，而應轉向「實踐」(la praxis)，即有目標、有行動力地在歷史中介入。「實踐文學」就是在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找到交會點，不是單純為理念而寫，也不是僅記錄現實，而是將道德責任（倫理）與歷史情境（現實）結合起來。然而，他並非主張“praxis”會取代“exis”，他認為兩種文學會歷史性地交替。當一個時代需要反省與行動時，「實踐文學」就會浮現；但當人們厭倦政治或陷入幻滅時，文學又會退回到「存在的反思」(existential)，如對個人孤獨、焦慮的描寫。這種歷史的擺盪也反映出文學本身的非穩定性與開放性 (Sartre, 1947/2017b: locs. 274-275)。

討論的兼容性與論述品質，是維繫民主社會正常運作的基礎，有賴於公共領域的基礎結構能有效引導公民的注意力，聚焦於與政治決策相關的重要議題，並保障多元競爭且具質量的公共意見。一旦言論的可靠性、品質與適切性的基本期待無法實現，公共領域的包容性便隨之瓦解，整體民主制度也受到侵蝕 (Habermas, 2022: 52-56)。基於此觀點，戰後創辦的《摩登時代誌》作為推廣存在主義文學的媒介，可視為一種對公共領域的傳媒實踐。其中刊載的文學、哲學、政治、社會等評論，皆經由當時各領域專家學者的審核與編選，構成一個經過「守門人篩選」的論述平臺。此機制不僅決定了作品的曝光與傳播方式，也間接塑造文學公共討論的方向與範圍，影響作品在公共領域中的流通模式與討論方向。此外，檢視其歷史經驗，使我們能反思當前數位環境下，思考在新媒介環境中延續文學公共性的可能策略，為理論與實踐的連結奠定基礎。因此，本節將以傳播學的守門員理論 (Shoemaker et al., 2009) 為主軸，探討編輯群在媒體運作中承擔的篩選與引導功能，以及其如何維繫文學在公共領域的批判性與社會參與。並依此探究：何以像《摩登時代誌》這樣的傳統媒體，在「傳播環境、傳播內容、傳播方式」三個層面上，相較於當今網路社交平臺，更能促成有意義的公共對話？

首先，關於「傳播環境」，這裡指的是一種能夠支持公共討論的整體社會與文化條件，包括公民得以參與公共表達的空間與實踐形式（如辯論、撰寫評論、閱讀時事、參與論壇等）、鼓勵公共討論的媒體結構，以及能夠激起或容許公民從自身經驗出發參與討論的生活世界 (Rosa & Voiron, 2022: 82)。此宏觀層面的社會體制會影響傳播中的守門員，因為他們並不是在真空中做決策，而是受到社會環境所制約，議題選擇往往取決於當下的社會情勢與制度背景 (Shoemaker et al., 2009: 82)。若以《摩登時代誌》創刊號 1945 年

秋為例，甫結束二戰的法國，正是傳播環境產生劇烈變化的時期。1944年8月頒布的新聞自由法令 (Ordonnances du 26 août 1944) 標誌戰後審查制度的解除，以及隨之而來的出版自由，新聞出版業因而迎來重建的黃金時期。根據當年統計，僅1945一年內就誕生了34份新報紙，言論風氣活躍，顯示出一種對公共討論渴望的文化氛圍 (Cohen-Solal, 1999: 435)。

為回應當時的思想風氣，《摩登時代誌》所設的論壇不限於單一領域，而跨足政治反思、紀實報導、調查寫作、文學、哲學與美學等範疇，尤其透過不同專欄刊載風俗民情、刑事案件、政治時事，以及文藝評論等。相較於提供單篇閱讀的視角，編輯更強調整體性策劃，從選文組合中勾勒出時代的共通意義與精神輪廓。因此，與一般雜誌慣例不同，《摩登時代誌》會「略過一部對揭示時代新思想無助的優秀作品，反而花時間去談論一部具有揭示性意味的平庸之作」(Sartre, 1945: 8)。波娃亦指出，「世上的一切都是種符號，其語意牽連到整體社會結構。我們刊物的獨特之處，就是去尋找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能揭露時代意涵的事件」(Beauvoir, 1963/2014: 82)。從這兩段話的聚焦對象來看，所謂的「優秀作品」(un livre excellent)，應該是指那些在文化評價體系中被認為立意高遠、處理重大議題的作品，但在《摩登時代誌》編輯部的判準中，若這些作品未能觸及時代的根本性問題，反而會被略過。相對地，那些看似瑣碎、不具宏旨企圖的文字，卻常在其細節中揭示出對時代的深刻啟示與群體感知的變化。這樣的選文邏輯，有別於傳統對「好作品」的審美或主題標準，體現了《摩登時代誌》作為公共場域的價值判準，也揭示了一種知識實踐的態度——相較於反覆爭辯抽象的意識形態，更傾向將具體事件視為可解讀的症候，從中辨識制度的運作

機制與缺失，藉此提出不同於主流的論述，將批判落實於一次次的行動中，推動現實可行的改變。

此外，主編梅洛－龐帝談及雜誌的撰文原則時亦指出，刊物的宗旨在於「對這個時代加以描述與診斷，盡可能完整且忠實地解碼當下，不預設其意義，甚至在現實出現混亂與荒謬之處時，坦率地承認其無序與無意義」(Merleau-Ponty, 1946: 597)。換言之，刊物要求寫作者不要急著為當下的混亂找一個看似合理的因果關係與意義，也不要從特定的意識形態或立場去看待問題，而先如實描繪混亂本身，逐步摸索出問題的輪廓，以便讓那些看似沒有意義的現象顯露出來，因為真正的問題往往藏在這些混亂當中。這不僅是一種對傳播內容的要求，更是一種公共論述與思維方法的訓練，呼應了哈伯瑪斯的主張：數位化讓每個人都成為潛在的作者，但正如印刷術的發明需要時間讓人們學會閱讀，社群媒體所帶來的自由發聲也需要透過學習與規範才能成熟發展起來 (Habermas, 2022: 41-42)。這樣的規訓並非限制言論自由，而是提供一種解碼現實的訓練場，特別是針對在論壇上發言的作者而言。哈伯瑪斯指出，社群媒體的發文者往往缺乏對自身「作者角色」的自覺，多數人仍以「消費者」的觀點閱讀、轉發與點讚，但民主參與所需要的，卻是以「作者」的立場出發，建構理想的溝通模式，協助人們理解公共議題、形成理性判斷，而非讓訊息任意複製與擴散，形成人人都在發言，卻無法對話的公共領域「分化危機」(le danger de fragmentation) (42)。換言之，主動建構論述、承擔責任、與他人辯論的能力，是必須透過學習與培養的「作者性」，尤其體現在對論述與表達的掌握，進而決定傳播內容的品質。

從傳播學的角度上來看，內容是指透過各種傳播管道所傳遞的視覺與語言資訊。它不僅是資訊的集合，更呈現出特定的形態與模

式，並在承載文化意義的過程中，逐步構成一種具有文化性、意義性的象徵性環境 (Shoemaker & Reese, 2014: 2-3)。換言之，傳播內容不同於對物理環境的直接描述，而將現實置於特定價值體系中，透過符號與敘事建構人們解讀世界的方式，並依媒體平臺的格式條件、議題選擇，以及影像與語言風格等方式來組織與呈現。這種非鏡像式的現實建構，既呈現作者對世界的理解，也決定受眾批判與反思的可能。

正因為傳播內容是作者對現實的主動建構，作者便不再只是資訊的傳遞者。這種主動介入的寫作觀，也可以從編輯與出版的歷史實踐中觀察到。例如波娃在《摩登時代誌》中，便展現了這種作者角色的公共實踐精神。她強調，公共性的書寫從來不是孤立的創作行為，而是一種與社會對話、與對手辯論的積極參與：

在一份月刊上，我們可以迅速捕捉當下的時事；幾乎就像私人通信那樣迅速地對朋友說話，反駁對手。當我讀到一篇令我惱怒的文章，就會立刻對自己說：「我要寫一篇回應！」於是，那些寫給《摩登時代誌》的評論文章就這樣一篇篇誕生了。
(Beauvoir, 1963/2014: loc. 82)

這樣的期刊不僅是理論文章的發表園地，更是一個能即時回應、溝通與論戰的論壇。此對話機制促成戰後知識分子在各自所屬的刊物中，展開對時代的詮釋與思辯，提供公共性重建與思想自主的媒介，波娃形容這些交流為「如家庭爭執般親密、急迫與熱烈的論戰」(Beauvoir, 1963/2014: loc. 82)。姑且不論此感受是否受到法國論戰傳統的影響而有所柔化，可以確定的是，雜誌倡導的不只是單向傳播，更是一種能夠回應、對話與辯證的言論文化。這樣的媒介環境，除了為文人作家提供將私人經驗轉化為具公共意義文字的訓練場域，也使讀者在反覆接觸立場分歧、論證嚴密的評論文章時，

逐步熟悉論述所需的邏輯結構與問題意識的界定方式；換言之，讀者不僅在其中接收知識，更學習如何從具體文本中辨識立論與反駁的策略，從而養成對公共議題的基本判斷。

《摩登時代誌》所強調的辯證式的寫作風格，正是其「介入式文學」理念的具體展現，特別體現在知識分子「面向讀者」的寫作策略上：「我們會運用各種文學形式來讓讀者熟悉我們的觀點，一首詩、一部虛構小說會比一篇理論文章更能創造有利於發展這些觀念的環境」(Sartre, 1945: 7)。以傳播學來說，「策略性傳播」是指組織有計畫地使用溝通手段來呈現自身理念、傳達使命，並達成特定目標。它強調組織作為社會的行動者，透過刻意安排的行動，包括訊息傳遞、關係建立與運用人脈網等，來影響目標受眾。與單純關注互動或訊息傳遞的溝通不同，策略性傳播重點在於組織本身如何用溝通達成社會目的 (Hallahan et al., 2007: 5)。從這個角度來看，《摩登時代誌》的策略性傳播建立於沙特對刊物目標的清楚認知，即有計畫地運用不同文學形式來介入社會，使存在主義思想擴散至更廣泛的一般民眾，也反映出雜誌創刊初期對公共性的重視：

關於此後的政治與社會事件，我們的期刊將在每個事件中表達立場。我們並不會以政治性的方式介入，也就是說，不會為任何政黨服務；但我們會努力揭示每一篇論述背後所依據的「人是什麼」的概念，並根據我們所支持的人性觀提出看法。如果我們能實踐此承諾，如果我們能讓一些讀者認同我們的觀點，我們不會因而自滿，只會單純因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專業良知而感到欣慰。因為至少對我們而言，文學能藉此重新尋回它本來就不該失去的社會功能。(Sartre, 1945: 3)

宣言中所指的「功能性」(fonctionnalité，即文學在整體社會架構中扮演的角色)，並不同於一般理解的「效用性」(utilité，即文

學的用處)。文學不是一種手段方法，不是為了達成某個具體的外部目的而存在的。它作為一個目的本身，旨在促進讀者的自由思考，透過想像力重建作品、超越作家留下的文本訊息 (Sartre, 1947/2017b: loc. 62)。所謂「文學作為一個目的本身」，指的是文學慷慨地呈現出世界的整體性，這種世界本質的呈現，就是一種文學的「絕對、超越性目的」(fin transcendante, absolue)，使讀者感受到其價值，跳脫出對效用性的渴求 (loc. 74)。因此，介入式文學邀請讀者進入文本，並在其社會意義中探尋文學的內在目的：對人類存在處境的探索，以及對社會結構的理解。在此理念下，「所謂介入式文學，其實正是存在主義文學」(Paulhan, 1992: 405)。它使人覺察自身的處境，並以自由而非規範的方式，重新思考自己的社會責任，以及與世界的關係。這樣的閱讀經驗無法被量化、收編為外在績效，因為它的價值，正在於其所能引發的自覺與行動。

由此可見，《摩登時代誌》可說是一個拓展存在主義文學陣營的媒介場域。它透過多元的專欄內容——如小說節選、專題論文 (文學或其他領域)、個人見證、生命敘事、書評與回應等——打破單一的文學傳播方式，使作品成為公共討論的話題。這樣的媒體策略，突破以往文人各自力求獨特性，但事實上只是模式或形式上的調整，無法跳脫社會期待的框架，也無法改變結構性的問題，而陷入不斷重複的困境。相對地，《摩登時代誌》透過「存在主義者的集體實踐」(Franck, 2017: para. 8)，讓每個作者與每篇文章協力回應當時社會的敵意、偏見與矛盾，凝聚成一股有方向、有意識的群體聲音，藉此超越個體之間僅是相互接續、卻依然孤立的狀態，組織成真正有力量、能夠推動社會變革的共同意識。換言之，編輯群的守門作業 (Shoemaker et al., 2009) 並不侷限於「作業慣例層級」——整合不同形式的專欄內容，執行不同體裁的固定搭配、回應與書

評的慣常安排——更在「組織層級」上，基於一種方向性的集體實踐，以組織化的方式回應並影響社會議題，突顯刊物超越單純出版邏輯進入公共領域之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主義者的集體實踐」在文學選文上其實相當多元。從雜誌發行到一九五〇年代初，已收錄了風格迥異的新興作家（包含莒哈絲 [Marguerite Duras]、Jean Genet、Nathalie Sarraute，以及外國作家 Samuel Beckett、William Faulkner、Scott Fitzgerald 等）。儘管部分作品未必以直接的政治論述介入社會議題，但透過刊登於《摩登時代誌》的平臺上，個人書寫被置於對現實矛盾、社會結構與個體處境的批判脈絡中，而納入介入式文學視野的詮釋中。¹³ 即使文本本身保有高度的美學自主性與形式多樣性，仍共同參與了存在主義推動的文學介入計畫，擴大了文學作為社會行動一環的可能性。例如《摩登時代誌》1950年8月書評欄介紹了莒哈絲的《抵抗太平洋大壩》(*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當此小說被推廣時，莒哈絲的書寫便被放進了存在主義者想要的揭露現實矛盾、批判社會結構的整體企圖裡。即使莒哈絲是在講個人悲劇，講家庭困境，她的故事也被讀成是在揭示殖民地（法屬印度支那）社會的不公，既為生活其中的貧困白人發聲，也為當地人發聲。這種連接公眾的話語框架，讓存在主義文學成為一種被廣泛討論的社會敘事。如波娃所說：

¹³ 梅洛－龐帝曾對介入式文學的範圍說明道：「從廣義上來講，任何文學作品只要說了什麼，就是介入參與的。文學始終在訴說我們與世界、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無論以詩性還是世俗的風格書寫。同時，由於文學力圖以文字表現、闡述真理來改變這些關係，它又不能宣傳佈道或使用世俗手段，因此文學又是『超然的』[*dégagée*]。但若從狹義激進的角度來看，『介入式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 會被理解為：忘記自己首先是文學；而『超然文學』[*littérature déagée*] 則會被理解為：什麼都沒說」(Merleau-Ponty, 1947: 1152)。

在一刻不得閒的動盪時代，人們希望文化關懷能與日常生活結合起來，文學與報紙之間的鴻溝能被彌補起來。人們渴望了解身處的、變化中的世界，如果藝術能夠抓住這些活生生的、棘手的現實——也就是在此之前學者們未關注處理的日常現實——人們的好奇心將會得到滿足。(Beauvoir, 1963/2014: loc. 72)

引文中提及的「身處的、變化中的世界」(Beauvoir, 1963/2014: loc. 72) 牽扯相當廣泛，並非文學「在地化」與否的問題，而是涉及跨國連動的歷史共同經驗與現實處境。二戰後的世界局勢相互牽動，無論是本文第一節闡釋的咖啡館中的國際文化交流，第二節小說文本中對世界各地事件的同時性敘述，抑或《摩登時代誌》對國際性作家作品的譯介，在在突顯出存在主義文學的超越法國本土、關注全球現實的意識。此種面向世界的關注，事實上與讀者好奇的時事緊密相連；作品所捕捉的「活生生、棘手的現實」(loc. 72)，連同世界情勢，嵌入當時歷史與社會脈絡。由此可見一種民主化的審美關懷：文學應服務更廣泛的讀者，尤其是關心社會現實、渴望理解世界運作的公民。尤其《摩登時代誌》的受眾階層分布廣泛，既包括學者，也涵蓋一般市民，在傳播過程中既是內容的解讀者，也是議題生成與引導的參與者。其中，議題生成與引導透過專題論文、書評與回應等專欄，而受眾的參與則透過個人見證。這種互動呈現出媒體－受眾的循環機制：受眾參與－欄位調整－議題形成，彰顯媒體生產與公眾關注密切連動。這種互動模式與當代數位媒體運作有異同之處：除了社群平臺的演算法與即時行為數據，編輯亦會「參照網路社群的討論，將其中的話題與關注轉化為媒體內容」(Aubert, 2023: 149)。雖然兩者皆呈現讀者對內容的影響與參與，但相較於短影音文章格式在討論上的侷限，《摩登時代誌》提供更充裕的篇

幅與討論空間，支援辯論與延伸，使議題在公共領域中呈現持續流動、反覆對話的動態過程。

總結此節，《摩登時代誌》的歷史案例有助於探究文學公共領域的運作模式，思考哪些層面具有跨時代的延續性，以及哪些層面與當代社群平臺的媒介條件與運作機制有所差異。在傳播環境層面上，二戰後社會有眾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不同背景與動機的行動者，嘗試透過書寫進入公共討論與文化場域，顯示生活世界對公民參與的驅動力。這種對公共性與批判性表達的渴望，也存在於當前的社群平臺。然而在傳播內容上，因傳統媒體結構的資源有限，戰後知識分子身為「守門員」具備較高程度的議題篩選與框架設定能力。相較之下，當代多軸心的網路生態則生成了一群「網路觀察者」(gatewatchers)，他們不僅進行書寫與分析，亦發表批判性言論，聲稱能揭露偏誤、提出報導議題與事件的正確方式，從而脫離傳統守門員的掌控 (Frinault et al., 2023: 308)。此類行動者與傳統媒體守門員的差異，在於其所處的平臺媒介控制與介面設定，如何影響其內容生產與傳播策略，能否維持公共領域所需的論證性，或滑向以情緒表達為主、立場鮮明但論據相對薄弱的個人敘事。尤其，當其傳播策略轉而服務於影響力擴張或特定群體利益維繫時，言論生產的規範可能隨之鬆動，進而影響公共討論的理性基礎。這與《摩登時代誌》透過有意識的集體發聲，引導讀者在文選閱讀中對政治與倫理議題進行反思，有顯著的不同。在此差異下，公共性如何被重組並持續生成，將為本文結論進一步探討的重點。

伍、結語

在哈氏公共領域的視角下，本文以存在主義文學為例，指出文學研究何以除了探討文本的內在意涵外，也應關注文本如何進入公

共領域、影響社會文化與政治討論。隨著文化作品日益媒體化，文學在公共空間中的討論與流通方式，已成為定義「文學是什麼」的關鍵所在。不同地方生產出不同的文學樣貌。如同文本分析第一節所述，空間不只是文學活動的背景，也影響文學出版的形式、能見度與社會意義。一篇文章發表在不同雜誌，或創作發生在不同的社會環境與場所，寫作方向、能接觸到的對話者，以及流通方式都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不僅依賴空間本身所提供的物理庇護（消極接待性），也深受關係人網絡的影響（積極接待性）——包括作者、出版者與媒體等。他們之間的連結關係，決定了能夠觸及與整合的文化資源，也進一步影響作品的風格、定位與可見度。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公共討論始終植基於帶有特定規範與意識形態的環境場域中。無論是咖啡館、酒吧或出版社，皆帶有各自的生態社群，地理位置與社交網絡牽動了關係人對外連結的廣度與深度，形塑其主體視野，進而影響作品在文學場域中的流通與接受。

換言之，公共空間中的討論，不僅與哈伯瑪斯所強調的溝通有效性（如語言運用、認知系統與社會適應能力）有關，也與所處場域的歷史脈絡、社會秩序與文化條件密不可分。咖啡館與酒吧等場所的象徵意義，早已超越空間使用層面，成為文學傳播體系中的一環。這些場所如同小說與期刊等媒介一樣，能夠具體化文學的意象，提升公眾對特定文學流派的感知與接觸的可能。尤其從空間的歷史意義上來看，這些場所不應僅被視為懷舊的文化記憶載體，也具備提醒功能：在注意力日漸碎片化的現代社會中，它們曾是個體得以停留、思考與討論的場所，承載著人們為共同目標，藉以展開理性的對話。這種從日常空間出發、在交談者的凝視與身體互動中思辨的文化實踐，在當前資訊環境下顯得愈發稀缺且急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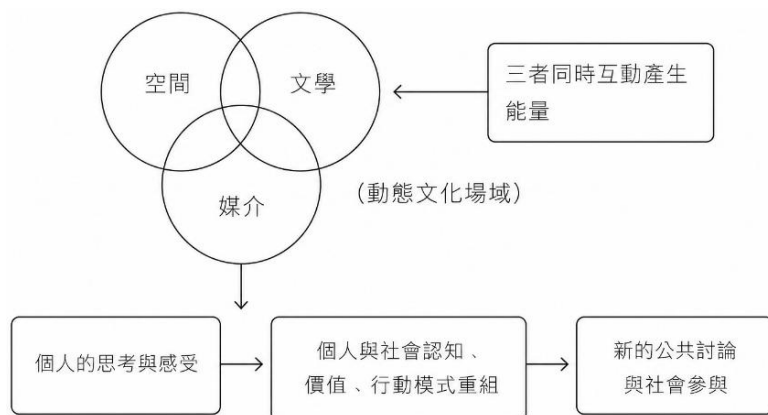
在文本分析第二節中，我們探討了「文學公共性」如何透過作品體現，成為公共討論的素材。哈伯瑪斯認為，其核心在於讀者將作品中的他人經驗內化為自身的理解與感知。這樣的主體覺察，透過公開討論中的人際交流形式來實現，並在反覆理性辯論中形成，最終成為評判公眾議題的倫理基礎（哈伯瑪斯，1990/2002）。相較之下，沙特作品呈現的「文學公共性」，更多源自於讀者與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讀者在創造性的閱讀實踐中被召喚為主體，透過情感的激發與思考的展開，意識到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進而發展出對當代現實的批判性視野與可能的行動意志（Sartre, 1947/2017b）。兩者看似路徑不同，實則相輔相成：哈伯瑪斯強調宏觀層面的公共理性與普世價值（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統一性、普遍性和總體性），而沙特則透過文學敘事中的個案情境，將歷史處境置於角色的日常之中。藉由人物生活細節與心理掙扎的描繪，使讀者覺察到主體性的缺失，突顯出歷史壓力下自由的重量，及選擇背後所需的多層面思考。這種私人性與公共性的交織，展現了文學討論涵蓋的範圍內容與論述方式——如何在詮釋文本的過程中，不只是表達個人直覺、立場宣示或主觀的價值判斷，而是將觀點建立在文本證據的基礎上，透過故事背景的辨析，處理人物之間價值觀的衝突。這種思辯過程的逐步養成，將為讀者進入民主討論提供健康的思維框架。

最終在第三小節，我們探究了存在主義文學經由期刊的傳播，在公共領域中流通的方式。《摩登時代誌》作為一份由知識分子主導、面向社會大眾的月刊，其文化實踐不僅體現了文學公共領域的延續與重塑，更彰顯了編輯群作為「守門員」的關鍵角色，透過辯證性的書寫取向、對時代問題的揭露，以及集體實踐的編審原則，引導了社會議題的走向。刊載的作品打破了報導與創作、日常與高雅、現實與想像之間的界線，重新界定文學的公共功能，賦予它一

種介入現實、激發社會責任的倫理角色。在此意義上，編輯群以「篩選—引導—介入」的方式，使文學不再只是表達主觀情感或美學探索的形式，而成為推動公共討論與社會參與的力量，實踐了沙特所主張的「言說即行動，行動即改變」(Sartre, 1947/2017b: loc. 31)的寫作目標。

總的來說，文學公共領域的生成，非單一路徑可循的歷程，不應被簡化為「文人選擇某空間 → 參與文學活動 → 獲得象徵資本 → 作品被傳播與討論 → 最終形塑公共輿論」的線性模式。空間、作品與媒介三者之間，事實上是一種非線性、互滲互構的文化過程。空間不只是創作發生的背景，其本身即是一種媒介與象徵資本的集結場；文學作品常是空間在文本中的再生產：吸納、映射並轉化空間的特質、歷史記憶與文化資本，而這些空間所蘊含的能量，正是作品得以豐富與深刻的關鍵；媒介則重新形塑了人們對空間與作品的感知方式，使空間超越物理存在，成為富含象徵與歷史層次的文化場域。同時，作品也因媒介的介入而被賦予新的閱讀與詮釋維度。簡言之，文學公共領域是一個由空間、作品與媒介互構而成的動態文化場域，其中文學將私人的思考與感受轉化為公共意識，促使個人與社會的認知、價值與行動模式進行重組，從而生成新的公共討論與社會參與（如圖 2 所示）。

承前文對《摩登時代誌》的分析顯示，文學公共領域的形成，有賴於傳播環境、傳播內容與傳播策略三個層面的共同作用。雖然具體形式深受歷史條件所形塑，但三者對應的公共功能——公共交流（空間）、內容生產（文本）與文化中介（媒介）——仍回應著一個貫穿不同時代的共同命題：思想如何離開私人領域，進入公共討論？為此，本研究提出「虛實整合的文學公共領域架構」，嘗試回應數位媒體環境下公共討論的新條件。此架構納入新的媒介技術、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圖 2 文學公共領域的運作與社會功能

閱讀習慣與社會互動方式，重新建構思想、文本與公眾之間的連結，拓展文學公共領域的實踐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哈伯瑪斯(1990/2002)所言，文學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包含文學家、科學家、哲學家與藝術家等，交流內容亦廣泛涉及藝術與時事。因此，本文提出的新架構並非僅限於單一學科，而是基於文學原初即具有的跨學科特性，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與作品。如下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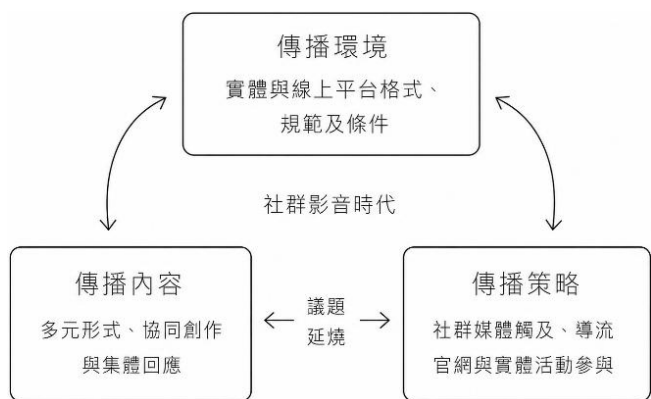
(一) **傳播環境**：透過官網與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hreads 等社群媒體的整合，建立便於青年與文化活躍群體參與的虛擬公共空間；另一方面依托沙龍、咖啡館、書店、圖書館等實體場所，提供面對面的討論與辯論，深化對文本及其社會、歷史脈絡的理解。透過虛實互補的設計，公眾不僅能在線上獲取訊息、提出觀點，也能參與實體對話，並在會後回溯至線上分享心得，延續議題討論，從而形塑一個持續流動的公共領域。

(二) **傳播內容**：除線上閱讀外，以長短影音呈現節選朗讀、文學講解、評論、作者訪談、讀者心得等，並結合廣播劇、聽書、Podcast 等多元形式。這不僅便於社群分享，也拓展受眾接觸文學的途徑。文本選擇不限於文學，而採主題性方式邀集不同學科參與，從各角度詮釋現實，並透過文章的串聯與對話，形成連貫的議題生成與延展，推動集體回應與實踐。主題聚焦於揭示現實的日常敘事，涵蓋與國際接軌的社會事件、跨國移動下的生命經驗與見證，以回應數位平臺時代的全球化思維。

(三) **傳播策略**：平臺以社群媒體與官方網站分工協作，引導受眾進行連續性的參與循環。社群媒體負責議題曝光、留言互動與實體活動發布，透過短片精華與連結導流至更深入的閱讀場域。官方網站則承接此流量，提供完整故事、專題報導、會員專區等延伸資源。此外，平臺依受眾的參與程度設計循序漸進的參與機制，從入門的圖文導讀與動畫概念解說，建立基礎知識與問題意識；到中階藉由 Podcast、讀書會培養閱讀、論述能力；再進一步成為撰文者，發展公共書寫能力，形成層次化、累進式的作者性養成，培養能持續參與公共討論的文化主體。

圖 3 架構中的三層次為互動關係：環境格式、規範及條件影響傳播內容與其策略；反之，傳播策略作為中介，既需回應環境條件以推動內容生成，也可能因策略的成功而改變受眾行為，進而重塑環境。尤其當議題延燒時，內容與策略之間亦會隨之調整。此互涉循環系統，在社群影音時代重新定義了文學呈現方式、受眾參與模式，以及公共討論的節奏。雖然仍需藉由後續的實際執行進行調整，但本研究嘗試以此整合平臺為核心，提供可借鑑的公共領域探索範例。公共領域並非必然衰退，而需要被重新建構與想像。透過文學

的介入，或許能開拓新的對話模式與集體實踐路徑，創造更深刻的公共思辨空間。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圖3 虛實整合文學公共領域架構

參考文獻

- 哈伯瑪斯 (2002)。《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王曉珏、劉北城、宋偉杰譯)。聯經。(原著 [修訂版] 1990 年出版, 初版 1962 年出版) (Habermas, J. [2002].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W.-D. Cao, X.-J. Wang, P.-C. Liu, & W.-J. Song, Trans.]. Linking. [Original work {rev. ed.} published 1990, 1st published 1962])
- Alloa, E. (2017). Internet n'est pas un espace public. *Esprit*, 12: 33-35. <https://doi.org/10.3917/espri.1712.0033>
- Ariès, P., & Duby, G. (Eds.). (1985).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Seuil.
- Astruc, A., & Contat, M. (Directors). (1976). [Film documentary] *Sartre par lui-même*. Éditions Montparnasse. <https://madelen.ina.fr/serie/sartre-par-lui-meme-2882?locale=fr>
- Aubert, A. (2023). Chapitre 5—À la recherche du public disparu dans les algorithmes. In *Une information brute? Journalisme, vidéos et réseaux sociaux* (pp. 133-156).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 <https://shs.cairn.info/une-information-brute--9782869383012-page-133?lang=fr>
- Ballarini, L. (2010). *L'espace public au-delà de l'agir communicationnel. Quatre renversements de perspective pour sortir des impasses du modèle habermassie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Paris 8 Vincennes-Saint-Denis.
- Bandier, N. (1992). L'usage surréaliste des cafés (1924-1929). *Bulletins de l'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20, 1: 112-124. <https://doi.org/10.3406/ihtp.1992.2214>
- Beauvoir, S. (2014). *La force des choses*. Gallim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 Berger, M. (2017). Vers une théorie du pâtir communicationnel. Sensibiliser Habermas. *Cahiers de recherche sociologique*, 62: 69-108. <https://doi.org/10.7202/1045615ar>
- Berger, M. (2018). S'inviter dans l'espace public. *SociologieS*. <https://doi.org/10.4000/sociologies.6865>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n.d.). *Fiche paysage sartrien*.
<https://classes.bnf.fr/pdf/Sartre3.pdf>
- Boschetti, A. (1985). *Sartre et « Les Temps moderne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Champfleury, J. (1872). *Souvenirs et portraits de jeunesse*. Dentu.
- Cohen-Solal, A. (1999). *Sartre: 1905-1980: Postface inédite*. Gallimard.
- Demoulin, E., Simont, J., & Louette, J. F. (2023). *Les Temps modernes, d'un siècle l'autre*. Les impressions nouvelles.
<https://doi.org/10.14375/NP.9782390700951>
- Dussault, E. (2014). *L'invention de Saint-Germain-des-Prés*. Vendémiaire.
- Ferry, J.-M. (1989).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 publicité politique. *Hermès, La Revue*, 4, 1: 15-26. <https://doi.org/10.4267/2042/15352>
- Forslid, T., & Ohlsson, A. (2010). Introduction: Literary public spheres. *Culture Unbound*, 2, 4: 431-434. <https://doi.org/10.3384/cu.2000.1525.10225431>
- Franck, T. (2017). La « mode existentialiste » : Lieux de vie et formes de pensée. *CONTEXTES*, 19. <https://doi.org/10.4000/contextes.6345>
- Frinault, T., Karila-Cohen, P., & Neveu, É. (2023). Chapitre VIII. Ruptures en cascade dans l'espace public. In *Qu'est-ce que l'opinion publique?: Dynamiques, matérialités, conflits* (pp. 299-347). Gallimard. <https://shs.cairn.info/qu-est-ce-que-l-opinion-publique-dynamiques-materialites-conflits--9782072961434-page-299?lang=fr>
- Grenard, F. (1993, October 5). L'interdiction du parti communiste en France en 1939. *Lumni*. <https://enseignants.lumni.fr/fiche-media/00000005870/l-interdiction-du-parti-communiste-en-france-en-1939.html>
- Habermas, J. (1987). *Théorie de l'agir communicationnel: Vol. 1. Rationalité de l'agir et rationalisation de la société* (J.-M. Ferry, Trans.). Fay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 Habermas, J. (1991). *Morale et communication: Conscience morale et activité communicationnelle* (C. Bouchindhomme, Trans.). Cerf.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3)
- Habermas, J. (2022). Un nouveau changement structurel de l'espace public politique (L. Corchia & F. Albertini, Trans.). In F. Albertini & L. Corchia (Eds.), *Habermas en terrain insulaire: La Corsica et son espace public. Avec un essai de Jürgen Habermas* (pp. 13-60). Pis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21)
- Habermas, J. (2023). *Espace public et démocratie délibérative: Un tournant*. Gallimard.
- Hallahan, K., Holtzhausen, D., van Ruler, B., Verčič, D., & Sriramesh, K. (2007). Defining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1, 1: 3-35. <https://doi.org/10.1080/15531180701285244>
- Kateb, G. (2000). Aestheticism and morality: Their cooperation and hostility. *Political Theory*, 28, 1: 5-37. <https://doi.org/10.1177/0090591700028001002>
- Lecoq, B. (1992). Le café. In P. Nora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Vol. 3, pp. 3771-3799). Gallimard.
- Letailleur, G. (2011). *Histoire insolite des cafés parisiens*. Perrin.
- Matonti, F. (1992). Quelques hypothèses sur les cafés littéraires. *Bulletins de l'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20, 1: 101-111. <https://doi.org/10.3406/ihtp.1992.2213>
- Merleau-Ponty, M. (1946). Pour la vérité. *Les Temps modernes*, 1, 4: 577-600.
- Merleau-Ponty, M. (1947). Notes [À propos de *Les Cahiers de la Pléiade*]. *Les Temps modernes*, 3, 27: 1151-1152.
- Mosna-Savoye, G. (Host). (2025, September 24). [Audio podcast episode] Olivier Mannoni: Sartre demande: Quel choix moral feriez-vous si tout s'effondre?. In *Le souffle de la pensée*. France Culture. <https://www.radiofrance.fr/franceculture/podcasts/le-souffle-de-la-pensee/olivier-mannoni-sur-la-mort-dans-l-ame-de-jean-paul-sartre-9403331>

- Paquot, T. (2009). Introduction. In *L'espace public* (pp. 3-9). La Découverte. <https://shs.cairn.info/l-espace-public--9782707154897-page-3?lang=fr>
- Paulhan, J. (1992). *Choix de lettres* (Vol. 2). Gallimard.
- Poulhès, L. (2017). 26 septembre 1939: La dissolution des organisations communistes. In J. Vigreux & R. Ducoulombier (Eds.), *Histoire documentaire du communisme* [Special issue]. *Territoires contemporains*, 7. <http://tristan.u-bourgogne.fr/CGC/prodscientifique/TC.html>
- Reckwitz, A. (2017).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 Suhrkamp.
- Rosa, H., & Voirol, O. (2022). Résonance démocratique ou mondes vécus cloisonnés? Réflexions sur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espace public au XXI^e siècle à partir de la théorie de la résonance. *Réseaux*, 235, 5: 73-101. <https://doi.org/10.3917/res.235.0073>
- Sapir, J. (2021). Chapitre VIII. Le 80^e anniversaire du Pacte germano-soviétique. In *Chroniques stratégiques: Des grandes questions de la stratégie à ses symboles* (pp. 127-145). L'Esprit du temps. <https://shs.cairn.info/chroniques-strategiques--9782847955071-page-127?lang=fr>
- Sapiro, G. (1999). *La guerre des écrivains (1940-1953)*. Fayard.
- Sartre, J.-P. (1943). *L'Être et le Néant*. Gallimard.
- Sartre, J.-P. (1945). 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 *Les Temps modernes*, 1: 1-8.
- Sartre, J.-P. (1947). *Situations I*. Gallimard.
- Sartre, J.-P. (1994). *L'Être et le Néant: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1976 Rev. ed.). Gallim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3)
- Sartre, J.-P. (2017a). *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 Vol. 2. Le sursis*. Gallim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5)
- Sartre, J.-P. (2017b).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Gallim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7)
- Schlessner, G. (2014). *Saint-Germain-des-Prés: Les lieux de légende*. Parigramme.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2014). *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 (3rd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930434>
- Shoemaker, P. J., Vos, T. P., & Reese, S. D. (2009). Journalists as gatekeepers.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 73-87).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877685-14>
- Stavo-Debaugé, J. (2009). *Venir à la communauté: Une sociologie de l'hospitalité et de l'appartenan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Vian, B. (1997). *Manuel de Saint-Germain-des-Prés*. Pauve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1)

Formation, Practice, and Transmission in Literary Public Spaces: A Case Study of the Existentialist Public Sphere in 1940s France

Huei-yu Hu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Cultures and Tourism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yuyu818@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on Jürgen Habermas's theory of the public sphere to examine how French existentialist literature of the 1940s constituted a literary public sphere through th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of space, text, and media. First, it analyzes the creative practices of Jean-Paul Sart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in public spaces such as cafés, reveal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the social sphere. Second, it explores how literary works transform private experience into public ethical reflection, thereby engaging readers as active subjects. Third, using the journal *Les Temps modernes* as a case study, it examines how literary works entered public discussion through the filtering of media gatekeeper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literature is not merely an aesthetic activity but also a form of public practice, and that its circulation is shaped by the dynamic interplay of space, text, and media. Even in an era of fragmented online publics,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retains the potential to contribute to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and social critique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connected physical and virtual spaces.

Key Words: public spac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existentialism, Habermas, media gatekeepers